

特 權 論

(論 無 產 階 級 民 主)

陈尔晋（陈泱潮）著

石肃文编

激 流 学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特权论 (论无产阶级民主)

陈泱潮（陈尔晋） 著

石肃文 重排

学习学习再学习，前进前进再前进！

激 流 学 社

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

著 者：陈尔晋（陈泱潮）

根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版本重排

原著作于1974年～1976年

版 次：2022年7月新编第1版

编 者：石肃文

出版单位：激流学社

才疏学浅，欢迎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仅供学习，不供盈利

迎着一切困难向前进！

目录

《特权论》	1
第一篇 历史性	3
第一章 修正主义	3
一、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制度	3
二、修正主义制度的特征	3
三、修正主义的现实含义	8
四、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9
第二章 反修防修	10
一、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	10
二、反修防修的理论任务	10
三、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	11
第二篇 必然性	13
第三章 根源	13
一、从何处才能找到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	13
二、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14
三、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14
第四章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	15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过程	15
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	16

三、此种生产的优越性·····	16
四、这时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	17
五、二重性的垄断政权垄断着整个社会生产·····	18
六、权力分工起关键作用·····	19
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21
一、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21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22
三、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23
四、任命制·····	25
五、等级制·····	27
六、国家机关自治化·····	29
七、神话党·····	31
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33
第六章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34
一、共产党的变化·····	34
二、劳动者的变化·····	37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40
第七章 危机·····	58
一、基本矛盾的不相容性·····	58
二、改良主义行不通·····	59
三、修正主义侥幸的机会和渺茫的前途·····	63
四、生死关头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70

第八章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75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	75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75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76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78
五、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	79
第三篇 现实性·····	84
第九章 基本方针·····	84
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84
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84
三、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86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问题的几段论述·····	91
第十章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94
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最高领导·····	94
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	97
三、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基础·····	102
四、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上层权力机构·····	103
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基层权力机构·····	110
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公民的个人权利·····	115
七、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定能得到满足·····	120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	122
一、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122

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123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	135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	138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145
六、危险的关头和极好的时机·····	151
第十二章 政策与权衡·····	156
一、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	156
二、对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	156
三、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	157
四、从拿破仑的失败和华盛顿的成功说起·····	161
五、重上井冈山，揽月捉鳖世上无难事·····	165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174
一、总纲·····	174
二、任务·····	175
三、途径·····	178
四、组织·····	180
第四篇 合理性·····	184
第十四章 扬弃论·····	184
附录：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189
1974 年 11 月街头张贴序言·····	191
正文·····	210

特 權 論

(论无产阶级民主)

陈尔晋

(陈泱潮)

第一篇 历史性

第一章 修正主义

一、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制度

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历史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只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剥削制度更为黑暗、更为狡诈、更为贪婪、更为毒辣和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当今苏联及其它修正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修正主义制度。

二、修正主义制度的特征

1.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

这种新型的剥削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2. 集体垄断共同占有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

3. 特权资本化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产阶级合股投资，然后按资本的大小分取利润，是将生产资料资本化来进行剥削。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是合伙执政，然后按权力大小分吸人民血汗，是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特权化，又将特权资本化来进行剥削。

4. 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相结合

这种使资本家望尘莫及的资本积累制度具体的剥削手法，主要是使用欺骗和强制并用的手法。一方面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敲打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锣鼓点，鼓吹着“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的破喇叭，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和手段，进行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利用物质刺激奖金一类推行血汗工资制度，诱骗劳动。另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政策，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视线，加剧战争准备，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断提高定额，提高生产指针、追索上缴利润等强制性的手法来奴役劳动，敲骨吸髓般地榨取剩余价值。

5. 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

这种修正主义制度，是使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处于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劳动人民时刻提心吊胆，防被吃、被欺、被整。可是他们总免不了被吃、被欺、被整。因为他们不仅是丧失了一切防卫手段，而且是丧失了一切。

修正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者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而只能奴隶般附首听命服从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支配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可以自由出卖。而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却沦为了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必须一切听从当权人物即所谓“组织”的摆布。苏修叛徒集团，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丰富的物质基础”等等幌子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前所未有的压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极端残忍的毁灭人性的专政、镇压。劳动产品不是劳动者所有，而是为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攫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对劳动者的残害尤其表现在精神上、思想上和人的基本权利上。奴隶主用奴隶的人身来殉葬，以显示其永恒的统治；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以劳动者的人的尊严、自由、主权和创造精神来殉葬，用以显示其绝对的占有。尤其难以令人容忍的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却还要强迫劳动人民“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恩典！”（《马恩选集》第一卷 4 页）为了取得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利益，劳动者被迫一方面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一方面又使自己物化为生产资料，处于毫无人权，毫无保障的水深火热的困苦境地，劳动者不仅是被重新剥夺，而且是被彻底剥夺。

6. 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社会法西斯主义

修正主义的政治，乃是人数极少的一小撮党阀兼军阀、财阀、派阀的寡头政治、宗派政治、行邦政治、法西斯政治、骗子政治，根本新没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与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方法相一致，这种政治只崇拜进行极端无耻的欺骗宣传的破喇叭筒和标志着法西斯专政的带血的屠刀。这种政治

用神化党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恐怖政策来压制批评，镇压革命；用昨天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今天的阶级斗争；用批判别人的卑鄙来掩盖自己的更卑鄙；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词藻来掩盖修正主义的丑恶本质……因而这种政治是标准的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资本主义制度是用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一卷 253 页）而修正主义制度则反之，是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灵光的掩饰之下的、冠冕堂皇的、因而更百倍无耻的剥削来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愈是大张旗鼓地将特权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奴役和阶级剥削宣布为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新愈是更加令人感到可鄙、可恨、可恶！可见修正主义“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马恩选集》第一卷 4 页）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使修正主义社会一切都染上了虚伪透顶的“灵光”。到处都散发着特权屠刀的血腥气。杀人和说假话，是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的本色，其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7. 面临严厉的挑战：周期性政治危机

这种极端反动和荒谬的政治，不管它披上了怎样华丽的服装和涂上了多么鲜艳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它内心的肮脏和黑暗。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行邦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和殊死格斗，是不会停止的。况且，修正主义的统治又正是坐落在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地下的溶岩，整个社会不可调和、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正在聚集着力量，并终将聚集起力量冲天而起！正如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它本身不可解决的，它本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要爆

发周期性经济危机那样，修正主义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它自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严厉挑战。在总危机爆发、总解决关头到来之前，这种挑战反映在大约每十年一次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上，尤其会强烈地集中反映在围绕着最高统治者继承权和权力再分配上而展开的血腥而丑恶的争夺及由此争夺而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上。

8. 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以上是修正主义制度在内政方面的特征。在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上，修正主义制度是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相对而言也可叫特权帝国主义）。垄断，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的经济特征和本质，是修正主义制度天然具有的。不过，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是来源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引起垄断，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则是通过政权的力量直接达到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则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否定一切民主这一特征，在修正主义制度下方才得到了最完备的体现。对内，“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的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列宁选集》第二卷 748 页）对外，对世界资源、市场、殖民地的掠夺、瓜分、扩张、渗透、抢占、侵略等等这些资本帝国主义具有的特点，社会帝国主义也都无不具有，无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帝国主义在进行任何损人利己的卑鄙勾当的时候，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呀，“国际主义”呀，“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经济互助”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等等旗号的。由此可见，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完全与

其对内的政策相一致；欺骗和实力并用。这种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有别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地方如下：

a. 社会帝国主义建立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基础上。

b. 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c. 因而社会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具有更高垄断性、更强的竞争力量、更贪婪的欲望、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

三、修正主义的现实含义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特征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已经不止是原来意义上的修正主义了。

在无产阶级未取得国家政权前，在私有制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通过什么道路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嘀咕“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那些与无产阶级并立的广泛的小资产阶级或领取资产阶级残汤剩饭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工人贵族；其性质不过是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和资产阶级策略上曲折变化的后果，不过是一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潮。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在公有制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固国家政权，究竟还要不要坚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一根本立场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用昨天资产阶级的剥削来掩盖今天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压榨；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口号下，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专政无产阶级，对整个劳动人民进行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是用嘴嘀咕，而是用执掌着印把子的枪杆子叫喊“最终目的是达不到的，官僚们的利益就是一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当权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其性质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自身利益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直接产物，是在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演变出来的一种扼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政体，一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新型的剥削制度。

因此，反苏防苏决不等于就是反修防修，事实是恰恰可以在偷运民族主义的货色中大干修正主义的勾当；只有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整个修正主义制度，并为铲除产生这个修正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源而斗争，才能算做反修防修。

四、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极严重的危机，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的解体，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种动摇。修正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它使社会主义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

第二章 反修防修

一、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

反修防修乃是在这样严重的历关头提出来的严重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历史注定“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语录》第22页）那末，修正主义制度妄图取社会主义制度而代之，就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坚决粉碎这股反动的逆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和共产主义方向，把被弄颠倒了无产阶级专政再颠倒过来，避免人类落入修正主义制度奴役的黑暗深渊，是反修防修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所在。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夺取反修防修的全面胜利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坚持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已经成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劳动大军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使命。

二、反修防修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的指南。”（《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25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复述，而在于运用。

同时，一切社会科学上的捍卫都是通过发展完成的，并且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捍卫。尤其当历史的演进已经经历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之后，更是如此。

但发展却往往好像是回复到从前的起跑线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覆亡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行动的条件、性质之后，第一次空想社会主义才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为使第二次空想社会主义重新上升到科学的殿堂，反修防修的理论必须完

成下述两个任务：

1. 揭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实质（即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只有查清病根所在，才谈得上对症下药。

2. 指明促使反修防修获得胜利的条件、方式和途径。

这是新变化、新时代、新任务、新实践对理论工作所提出来的要求，历史已为满足这样的要求提供了客观条件。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332 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必须重视对反修防修理论问题的研究和传播。“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337 页）。

三、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才从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真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幅员广大、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特定环境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选甲种本》337 页）的真理，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惨痛的历史事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鉴戒。对外，主要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威胁；对内，主要面对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危险，更是促使中国人民十分痛切地感触到修正主义的反动和危害……历史就这样把反修防修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的对苏大论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反对修正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奴役人类的历史篇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不能让红旗落地的呼声和实践，贯穿整个运动过程斗、批、改的反反复复；伴随着整个运动深入程度的惊心动魄的殊死的政治大搏斗，一直震动着中国人民的身心。毛主席亲自敲响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钟，更是使千百万革命者从朦胧中警觉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发动、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积累了自身反修防修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培养了一批志在反修防修的理论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枷锁，使中国人民从对神化的迷信中，返回到对现实的感受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打破了坚冰，标明了航向，从而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尖端。如果说，五四运动曾经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的话，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必将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在“预期看，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161页）现在看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肩负反修防修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要有一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中国是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来的！

第二篇 必然性

第三章 根源

一、从何处才能找到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

无疑，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仅仅停留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去探寻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彻底运用。我们不但要看到阶级斗争的现象和后果，而且应当看清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个时代只产生这样的阶级，不产生那样的阶级，等等。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马恩选集》第三卷 307 页）。

显然，修正主义制度之所以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诚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在公有制确立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和复辟的危险性确实存在过。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进步，都使以私人的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难以简单重复了。修正主义的压榨方式，已远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所能比拟。

因此，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虽然这些影响、包围和压力不无作用。使修正主义制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乃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

二、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这种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其性质是什么呢？能不能说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呢？我们在不久即将展开的分析考察，在这里先姑且不谈。“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修的事实，中国存在着变修的现实危险，都说明了：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过是具有两重性的过渡的社会。它在表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还更表现了向修正主义的过渡。这样的社会是不能就算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按习惯把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就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叫做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此之时，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及由此矛盾代来的骚乱、动荡、傍徨，与其说是在感受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前的阵痛，毋宁说是在承受着社会主义社会分娩过程中的痛苦。为使社会主义不至夭折变成修正主义怪物，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三、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兼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第四章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过程

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关键性的一步迈出来的，是直接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保护民族资产阶级，把土地分到个体农民手中，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生产出现了五种经济形态。在这个时候，尽管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尤其是具有一定资本的私营工商业，和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市场，对国营经济客观上仍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同时，资本主义的泛滥，使衰弱的小生产者、个体农民濒临破产，加速了贫富悬殊，尤其是农村阶级的新分化。这一切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问题，及时地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政权强大的暴力、强大的舆论力量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依托，通过集体化的道路，通过先公私合营，最后完全纳入国营的道路，将社会生产资料基本纳入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国在一九五六年即解放后的第八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有别于自由竞争引起集中，集中引

起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这个改造过程的特点是：在通过国家政权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同时，把整个社会的生产都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垄断起来了。

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归于消灭，而是将这种生产通过国家政权，通过公有制，进一步高度集中和垄断起来，达到高度组织化的程度，将政治领导权和经济支配权统一起来，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生产力。本着这样的出发点，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生产、工业按生产系统、产品分类集中统一起来，形成了国家垄断，这是不用多说的了。就是农业，也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国家垄断的金融信贷网和商业购销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控制了整个经济的流通和交换命脉，不仅如此，即不仅仅只是实行了有组织的生产，而且还实行了有组织的生活和有组织的思想。党的组织以及在党领导下的各种政工、群众组织，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统一战线、各种学习小组……等等组织，以及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和户籍制度，渗透到了每一个有人的地方，渗透到了每一个生产岗位，渗透到了每一个社会角落。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张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

三、此种生产的优越性

这种政经一体化，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能够极有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组织整个社会财富，发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使之投入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最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主义的机体。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遵照客观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及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用以满足发生变革以后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么，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取缔官僚特权，限制并逐步消除旧的法权关系，从而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这种社会生产将因使每个劳动者获得了解放，从而也使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因而一定能够取得以往任何生产形式都不可能比拟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四、这时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否定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方式，但仍然服从私人占有管理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需要资本家行使集中管理的职能，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社会生产更是需要组织者行使高度集权的管理职能。而这种管理职能如同资本主义的管理职能一样：“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367 页）公有制生产管理者如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一样，既不是劳动者推选代表来管理，更不是由劳动者直接管理，而是由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机关指定的管理人员专职管理。因此，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仍然存在。这种管理的二重性表现在“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368 页）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存在着一个归属问题，即所有权是不是真正地掌握在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县官不如现管”，而新生的官僚特权则力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力图一天天膨胀在生产、交换，尤其是在分配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大量的私有制残余和小生产的残余在新的劳动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庇护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不但没有可能取消，反而因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发达繁荣起来。粮票、布票、其它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票证充斥于市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黑市成灾，资本主义商业投机获得了可靠的保障。计划经济的管理极不完善，往往需要以协作的名义进行自由调节，以至依然存在着标准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市场。更不用说农产品的自由市场了。正如列宁指出的：“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兼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中，凝固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石。

五、二重性的垄断政权垄断着整个社会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依靠市场情况来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则依靠政权（实质就是党权）来掌握。在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里，生产什么——由政权的计划来规定；怎样生产——在政权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怎样交换——在政权的指挥下统一调拨，一句话，垄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但是，如同公有制本身就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机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结石——一样，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生产也有两重性。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是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也就是说，垄

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造成了生产对权力的极大的依附关系，造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过敏性反应。以至只要政治路线稍有波动，就能够使整个社会生产受到震动。生产的方向、性质，生产的效率等，都会因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改变而改变。而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在存在着阶级、产生着阶级的社会里，是时刻存在着两重性的。这种两重性，不是体现在同质的政治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物的必然更迭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权力性质的能够异化上。毛主席一再敲响警钟，要人们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7年13期《红旗杂志》）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两重性。

六、权力分工起关键作用

这一切都反复说明了，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生产里，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力量，乃是政权的力量。常识告诉人们，权力不仅需要一定的机构来体现，而且必定要由一定的人来执行和掌握。权力性质愈是取决于思想政治路线，参与制定路线，执行路线的人的因素，也就愈加显得重要。因此，谁掌权，怎样由谁来掌权，谁怎样掌权，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方向、性质和效率，权力分工成了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过程的关键所在。“路线是根本、领导关键”完全具有丰富内容的深刻的经验之谈。立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一定将使整个生产充满革命的活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速度奔向共产主义，立于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也必将使整个生产充满反革命的恐怖和日益深重的惰力，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落入修正主义的火坑。分工的正确与否，不但取决于分工的路线立场正确与否，而且取

决于分工的方法途径是否正确。是依靠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大众自己选择领导，还是将领导强加给他们？这就是在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分工上的核心问题。

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一、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5 页）——这就是共产党人要把传统的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战斗宣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仍然只有共产党才能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当时执政的，也毫无疑问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能执政，是由于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掌握了这个必然性，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赢得了人民信任、爱戴和拥护，团结和动员了人民的力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共产党掌握政权，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的事情，而是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不仅面对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面对着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及整个社会习惯势力的抵抗。尤其是当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趋势还未达到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只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能不依靠暴力夺取政权，共产党发动人民大众，以革命暴力粉碎了反动暴力，推翻了剥削者，剥夺了剥夺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证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要取得政权，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样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也初步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进行土改以后，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把对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造，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完成了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任务。共产党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也就全面完成了从组织上对国家各级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进步行动。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从组织上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要想取得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改造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新社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包围，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和颠覆的危险，面对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抗，尤其是面对着一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本能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不依靠专政的铁腕，以暴力为依托，实行所谓“独裁”。另一方面，刚执政的共产党正处于极富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刚开拓了掌握政权、实现理想的光明前景，还未受到权力地位的致命腐蚀和分化。在这个时候，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才刚刚开始或基本完成，公有制的基础还不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企图正每时每刻、通过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的小生产势力变为现实。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能够通过十分之九的居民享有民主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共产党及其所掌握的政权来体现。同时，处于资本高度集中、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经济结构中，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挑战，要对付国际资本的包围，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的处境，都要求必须以进步的集中反对反动的集中，以革命的垄断反

对反革命的垄断。由于这一切原因，共产党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并通过这一点，垄断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权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这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的。这种固定化垄断本身，是对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保证，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我国在公有制改造前后，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时候，尽管固定化垄断政权的共产党人毕竟不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支持和拥护。因此，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状况，在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虽以暴力为依托，但不算强制性迫使社会接受的东西，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桎梏。

三、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但是，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其实从一开始就落入了一种特效腐蚀剂中。

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就权力的起源来讲，如上兹述，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种需要，不过是执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是，当权力在行使这种职能的时候，也就具有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可能。权力除了必然赋予当权者以特殊利益以外，还同时赋予了当权者谋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极为方便的条件。恩格斯说得好“社会生产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

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有着权力“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马恩书简》单行本，第68页）这种所谓独立性，就是当权者在行使管理职权中，有着摆脱广大生产者监督而享有特权的现实性。只要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马恩选集》第三卷221页）“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三卷321页）——这就是迄今为止一切权力机关所共有的属性。使权力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的那些缺点。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一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

显然，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一般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一趋势。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赋予了当权者以特殊的地位，使当权者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权者更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则更使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强，从而变得更加特殊。而这些就正是推动一般权力向特权膨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之所以向能够大量占有无偿劳动、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权转化，就实质来讲，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

社会生产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决定的；而就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完成的。

这种实质和形式的一致，实在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权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蚀性。这是以往一切权力的腐蚀性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以往的权力其腐蚀性就是酸性剂的话，那么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权力，其腐蚀性就完全等于特效腐蚀剂——就算是强酸剂 H_2SO_4 吧。

很明显，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蚀剂 H_2SO_4 中了！！

四、任命制

任命制历来就是奴隶主阶级专制、地主阶级专制、资产阶级专制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一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一群宵小，并把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 142 页），另一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过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同上，第 194 页）。诚然，在社会变革的初起阶段，在新兴力量尚未取得统治和尚未巩固统治的时候，任命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统治权的取得和巩固，由于矛盾的转化，由于权力的腐蚀性，总的趋势是无疑的：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污、搞专制恐怖的。因此，连资产阶级中的民主共和派，都早就不齿于使用任命制了。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美国，除了在历史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任命制的样本外，只有在粪坑里才能找到任命制。当然，在这些国家里，某些职务的人选还是任命的。但是，这种任命已经

不成其为制度了，这种任命不过是在普选制议会制之下的一种间接选举方式罢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而任命制恰恰起到了抹煞这一点的作用，把权力的给予当作上级领导栽培恩典感激涕零。那些希图高官厚禄的人，削尖了脑袋，摇着尾巴，变尽法子，拼命讨“领导”的欢心。无原则地服从、顺从，卑鄙无耻地谄从，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的受任命、得提拔。高级官僚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关心的是维持住到手的荣华富贵，保持住旧质的稳定性。政治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导致了用人路线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不是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就是专门网罗走狗奴才：“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韩非子选》42页）从而导致了当权阶层日益腐朽，日益无能，日益没落，日益反动。

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下，任命制造成了当权者只为他的乌纱帽和提拔他的上司负责，不为他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负责。

任命制加剧了政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任命制强化了专横跋扈掉官僚统治；任命制培育了无耻透顶的奴隶主义，终将使政治风尚坠落败坏到极其卑鄙肮脏的地步；任命制繁衍滋生了政权体系内的宗派主义并导致了宗派主义战争；……归结为一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的任命制，将劳动者、人民大众的主权剥夺殆尽！

因此，可以断言：任命制是阻挡继续革命的堤坝！任命制是束缚人民民主手

脚的锁链！任命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门径！

有人说，苏修不是也进行选举吗？请问那是怎样的一种“选举”呢？首先，候选人就是“领导”内定的。而“领导”内定的候选人，实质上就是“领导”所要任命的“接班人”。你选谁？苏修的所谓选举，纯粹是骗人的把戏！所谓“选举会议”不过是架表决机器，所谓“选举过程”无非是演场木偶戏：操纵者要木偶举右手，木偶难道能够举左手？这种选举，对于权力本身来说，是自我欣赏，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于玩场权术游戏，目的不过在于“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126 页）对于人民来说，则地地道道是受欺骗、受玩弄、受蹂躏、受残踏、受侮辱！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堪忍受地被剥夺！

五、等级制

如果说，任命制就是维系官僚军事机器的法宝的话，那么，等级制就是官僚军事机器的标志。“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恩选集》第一卷 251 页）等级制伙同任命制，将国家政权委托给以攻为守深中官僚主义毒素，从官僚主义阶梯上爬起来的“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历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都是依靠等级制对社会实行金字塔式的统治。等级制又推崇资格论、台阶，看门阀、分地位、排辈份、叙长幼。等级制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因循守旧的胃口，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奴化人民的需要。等级制唯陈旧腐朽蠢物的马首是瞻，人的革新

创造性遭到扼杀，风华正茂气饱力壮敏锐灵活的青春活力竟然成了人的弱点！时代变化了，形势变化了，但等级制不允许领导者有变化，等级制惯于用上一个时代的人治理这一个时代的人，用前一个时期的人统治后一个时期。等级制使统治者高踞于人民的头上，以至人民要仰起头来才看得到统治者的脚跟！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消除了这种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是人为地更加强化了完善了这种等级制度，比资产阶级社会更甚一层地僵化了这种等级制度。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等级，不是等级一般，而是等级森严！不但在政治上把人分成等级，比如仅行政干部的级别就有二十多级；而且在经济上分等级，单工人这一级之内就又分成八级；不但在工资上分等级，而且在货币的票面价值上也分等级，同样一餐饭，劳动人民可能二十元钱吃不下来，但有的人却可以用一张报销单一笔勾销或付两毛钱了事。同样一斤肉，一个是国家牌价，一个是黑市牌价……你想想看！连货币的票面价值往往都因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这样大的等级差别！这还罢了，尤其难于令人容忍的是，甚至在知识上，在新闻上，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也分等级！某本书、某个文件、某部电影、某条消息……只能发到某个级别，只能传达到某个级别，只能给某个级别的人观看、传阅，只能让某个级别的人知道、掌握……等等，等等！怪不得在这样的等级制下，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使用等级制巩固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等于重新变相恢复私有制，等于明明白白地重新划分阶级！等级制下的领导艺术，不需要创造力，只需要简单机械传递的低能。等级制要奴才不要人才。领导要的是不学无术、毫无工作热情和革命干劲的混虫。但是他却能以传达“机密”到他

那一级的文件，以传播和人民隔绝的上层统治集团的消息讲话来炫耀他“很有水平”，他把下级召集来听他指手划脚口沫横飞的“报告”，无非是把上级吐在他口里的唾沫重新吐出来，到底有哪一句是属于他自己有所创见的闪烁着活的思想火花的话呢？他没有，也不能！要不就是无偿地掠夺他人的劳动，将秘书或僚属所写的稿子拿来呆头呆脑或装腔作势地念一念。等级制不需要德才具备的人从事政治，人才横遭摧残和压制。

等级制孵化官僚主义者阶级；等级制加速了当权者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等级制加深了当权者和人民大众的隔阂和对立——一句话，等级制将劳动人民置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使劳动人民只能承受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的份；因此，可以说，等级制是促使官僚政治日益昏溃腐败的催化剂；等级制是压在人民民主头上的顽石；等级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支柱！

六、国家机关自治化

在任命制和等级制的协同下，国家机关完全得以自治化。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就是人民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当权者，当权者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不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去发号施令。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也就是当权者能够有效地剥夺和压制了人民的主权。国家机关自治化，为当权者对批评他们的人执行打击报复，横加迫害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人民既不能选举，也不能撤换，对国家机关的施政状况，劳动人民无权与闻。比如对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指标的规定，生产成本的核算，生产过程中货币流通的收支状况，尤其是对生产利润的

使用，产品的分配……等等，这些与生产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生产者大众根本就没有权力参与讨论、制定、规划、核算、审查，更谈不上参与支配了。相反，国家机关想怎样处理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怎样处理这些产品，反正你生产者不用管，就是你想管，也管不了，管不着。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 782—783 页）显然，在高度组织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实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过程，就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所有制的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的话，那么，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资本则转化成了特权资本。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者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同时，变成了自由劳动者。而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是使劳动者在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中，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会说话的工具”。这样，国家机关自治化就使“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13 页）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要害就在这里，使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变成了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军事统治机器，使官僚主义者阶级完全有可能狂吞滥占人民财富，狂饮滥吸人民膏血。

因此，可以说：国家机关自治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徒有其名的蠹虫们的藏身

之所！国家机关自治化是箍在人民民主身上的紧身衣！国家机关自治化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季节所有制的政治壁垒！

七、神话党

使上述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得以恶性发展的，是对党的神话。所谓神话党，就是要人民像佛教徒膜拜如来佛观音大士那样来膜拜党，就是要人民象基督教徒敬礼上帝那样来敬礼党。首先将党的领袖偶像化，菩萨化，然后进一步将党的各级组织，甚至将个别党员都一概偶像化，菩萨化。“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支部就是反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我是党派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党”“对党的领袖人物言及批评的，就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所谓神话党，就是决不允许人民对党的看法、主张和做法持有异议，更不允许持相反的态度；在党的面前，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倘有不敬，立即取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而且坐牢杀头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影响后代，累及朋友，十恶不赦万劫不复！

但是，党绝对不是由理想王国中的上帝和极乐世界里的如来佛组成的，而是由现实生活中要穿衣、要吃饭、会活动、会变化的人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阶级的人。而人的阶级性是由他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并会随他的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什么从娘胎里带来就一成不变的东西。人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不保的情况下，确实会是最革命的，但在身暖腹饱环境不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革命性往往跟前者就不尽相同，而在身享尊荣、掌握特权……的

情况下，一般来说，就会更加不同了。

可是，对党的神话，却不允许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持较为客观的态度，神话党在不允许人民客观地看待党的同时，也就是不允许党清醒地正视自身的客观状况。

其实，这种神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早已有之。请听卢梭是怎么说的。他指出，这是“那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表面上尊奉圣教，实际上却极为残酷的人们的可怕的信条，这些人往往借口维护所谓上帝的权利，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血永远受到尊重，而对人类的血则毫无吝惜。”因此，对党的神化无非就是在重复僧侣和教会用天国的永远幸福为幌子巧妙地剥夺人们现实幸福的旧把戏。对党的神话就是用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将马克思主义变为新型的僵死的宗教教义，就是要将充满革命精神的党变成一个新的极端残酷和腐朽的僧侣集团。

因此，神话党就是用天才论和形而上学的毒汁毒害党、瓦解党，从而使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为奴隶总管党、官僚老爷党、老虎屁股党、修正主义法西斯恶霸骗子反革命的“共产党”，加速党的革命性在任命制、等级制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腐蚀下濒于毁灭。因此，可以说：神话党是使党变修国变色的桥梁；神话党是缠住人民民主思想的毒蛇！神话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基础！——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极其巨大、极其特殊的腐蚀性。毫无疑问，这种特效腐蚀剂的腐蚀对象，就是那已经跳进这种腐蚀剂中，喜欢游“一元化自由式”的集政治经济

大权于一身的少数人——执政的共产党。

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恩选集》第一卷 169 页）辩证法的威力无处不在发挥作用，辩证法胆敢把神圣事物置于永不停顿的发展、流动过程之中，辩证法竟然胆大到这种程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马恩选集》第四卷 213 页）因此，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合对党的神话而完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任凭这种上层建筑统治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废。因为这种上层建筑必将对公有制经济基础发生恶性反作用，改变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来到了。在这个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化垄断，转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成了束缚社会变革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由社会变革的合理需要，变成了阻挡社会革命的垃圾堆拦路虎。这种转变，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转化，同样是发展的必然。

“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马恩选集》第四卷 256 页）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进一步加以证明。

第六章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一、共产党的变化

1、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共产党由昔日的国家的造反者，变成了今日国家的统治者，因而使自己从被政权迫害的对象、镇压的对象，变成了受政权保护的对象、腐蚀的对象。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即在处于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执政的共产党既拥有主宰整个社会的巨大权力，也面临被整个社会新旧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内外进攻和腐化的危险。共产党因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蚀剂中。这种情况势必使处于这种地位、享受此种利益的“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严重的问题是，糖弹与其说来自于敌人的阵线，毋宁说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营垒，与其说来自于别人的赠予，毋宁说来自于自己的需要。此种地位的变化，埋伏着使一个穷苦而精悍的小伙子变成一个虽拥有巨资而鸦片烟瘾日渐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险。

2、敲门砖

入党做官的毒雾包围着党。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支配下，资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只有依附强权、通过特权才能增殖。或者说，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

转化为特权资本。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就是能够生出更多货币来的货币，而在公有制社会里，资本却成了不要一文钱就能够索取到很多货币的特权。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垄断政权就能垄断一切的状况，使社会上所有企图吸血的臭虫都想方设法要混进党内来。因为权力是共产党固定化垄断着的，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官，不能掌权。这些品质恶劣、手段卑鄙、贪图禄位、一心想吸血的投机分子，把入党当作了做官求荣、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高唱着对党的赞歌，高举着拥护党的双手，投和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胃口，披上种种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涌入了共产党内。以至列宁曾经十分愤怒地断然说过：“我们应当说：现在，当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坏分子要混到党内来。”（《列宁全集》第 30 卷 161 页）当冒着生命危险为真理为光明而战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情况是以巩固的地位长期稳定地执政的时候，党遭到入党做官毒雾的包围，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 393 页）成问题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 76 页）入党后，又反过来按自己的志趣物色和发展“新同志”入党。拉出去，打进来，已经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开明的、能够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 33 页）即真正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先进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状况，却有使执政党成为藏垢纳污、集污秽于一身，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

3、癌细胞

走资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出现。事实上，上述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险早已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了。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事，就是证明。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只要看一看他们不准农民开垦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产计划指标以外的产品，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苦大仇深”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孙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只要看一看他们压迫人、剥削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骗、投机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权、吃特权、和特权命相连，就知道他们不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一体化进一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一切固有的特征。他们自从尝过人肉之后，就不愿意再吃别的东西了。这个派别的出现和共产党的上述两个变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这个派别数量发展的总趋势不是减少而是每日每时都在有新的增多。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瓦解着执政的共产党的战斗力和严重地改变着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素质。这是一个隐藏在执政的共产党体内，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有朝一日要使其发生质变成为修正主义法西斯党的“癌细胞”。

二、劳动者的变化

1、要当家作主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给劳动者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使劳动者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的奴化意识中初步获得了解放。从前，无产阶级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对象，劳动者除了挨冻受饿以外，不可能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来，正如马克思所引叙的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 57 页）这种情况，迫使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地主。可见，劳动者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遭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而现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已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样，劳动者就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和这个解放相应的，是劳动者愈来愈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集团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奴化意识，第一次被打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改变，以及伴随这一改变过程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劳动者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当然主人翁的地位，愈来愈明白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国际歌》所表达的思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愈是深入劳动者的心灵，他们对救世主、对神

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就愈是得到确立；因而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无权过问的地位，而发出了直接参加管理的要求；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参与分工；他们就愈是不满足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生产关系而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要当家作主，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矛盾混合物

劳动力从商品性质转化为一身兼具主体、商品、无条件绝对服从物性质的矛盾混合物——这就是劳动者的第二个变化。从前，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这一点上，在实践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意识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矛盾。而现在，公有制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党所不断宣传的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力图使劳动者明白使用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不是为他人干活，而是为自己而干活，要劳动者在思想上明确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并不等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尽管在宣传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雇佣劳动，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作用，劳动力却还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工资制度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表现：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从前，劳动者是在组织性较为松散的社会里生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和居住地点，多少有一定的自选余地，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出现，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者，因而在那时劳动者“是自由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 782 页）。而现在，劳动者是在政治经济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里生活，劳动力已经

不是作为自由劳动者，而是在组织中的劳动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属于政经一体化起来的组织，属于社会。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什么地方使用劳动力，是由“组织”决定的。作为一般劳动者的分工，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可能凭你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想到那个部门就到那个部门。没有“组织”的分工，不经过“组织”的安排和允许，你就休想变换工作和迁徙居住地点。你生产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生产，在什么时间内进行生产，等等，无不服从握有权力体现着“组织”的上级领导的支配。可见，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于交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盾混合物。这一点，正是交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的一切了解全在这上面”（《马恩通信集》第三卷465页），“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评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7页）

3、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

劳动者本人不能随便选择场所使用劳动力的状况，更使劳动者产生了一种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干预指定给自己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务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因为劳动者力图寻找发挥自己思想意识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使这种指定给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和生活

环境，与劳动者一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发生了紧密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不但往往是徒劳的，而且往往要给予干预者本身带来祸患，饱尝权势迫害的苦头。劳动者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极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极的教训必然冒了出来：各自随大流混混过，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么当家作主，什么创造性劳动，与我们毫无权力的劳动者，简直隔得太远太远了！劳动者在现实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下去。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单行本 35 页）任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都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充分的解放了出来。当着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受到压制和摧残，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击和扼杀，自主的劳动热情普遍被泯灭和窒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桎梏的一个明证。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1、境异时迁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阶级关系基本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历史文献中，已经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关系、用以分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真正的敌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以外，这主

要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革命的基本对象，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个主要问题和基本对象，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但是，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后，阶级关系是否还是老样子呢？除了丧心病狂、狼心狗肺企图混淆视听的骗子以外，几乎每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回答：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依附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且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2、阶级关系变化的根子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为，阶级首先是“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马恩选集》第一卷 38 页）“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 321 页）

不错，阶级划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私有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私有制的产生最初也是由于分工而引起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当分工去管理这些剩余产品的人在把管理职能变为剥削职能，因而把属于生产者大众共有的社会剩余产品窃为己有的时候，私有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 37 页）可见，分工不仅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而且是私有制产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会所由分离出阶级来的基础。

是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马恩选集》第四卷

482 页)从分工的观点来看,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是颇有些与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状况相仿佛的。从分工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仅仅不过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方面改变了私有制,还远远未“就活动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制,因为产生私有制的前提即阶级分化的前提,在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依然存在。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现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分工的观点看,叉路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一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子。

3、关于阶级的定义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 29 卷 382 页)

4、新的阶级关系

(1) 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

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把浩如烟海的整个社会上的人,简化成了两种人:管理者和生产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进一步使这种简化同化,打破这两种人的分界线,从而“达到消灭一切

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马恩选集》第四卷第 332—333 页）

但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状况及与此相应的固定化的社会分工，却使这种简化又大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使从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恩选集》第一卷 251 页）

这种代替主要表现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是穿着共产党紫衣红袍的现今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已经从资本的雇佣劳动变成了特权的奴化劳动。地主资本家声名狼藉的剥削已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冠冕堂皇的剥削所取代。

（2）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首要标志，就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特征就是强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领导 and 经济支配大权于一身，享有所谓“一元化领导”实则为“一人化领导”的特权，并且利用这个特权“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 1964 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体系中，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公有制社会生产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状态下进行，劳动者也就生活在这种严密的组织网中，他们的一切都得服从组织的分工和支配。而所谓“组织”，实质

上就是那么少数几个垄断着权力的人，其当然的主要代表就是“一人化领导”者。而这些“一人化领导”者，又是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这样的体制上形成对权力的垄断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之所以能掌权，全是上级组织提拔信任的结果。一般来说，人民无权决定他们的前途，因而他们只在上级面前表示服从，而对在他们职权管辖下的人民则无所顾忌或顾忌甚少。他们愈来愈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演变成为特权。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从而垄断一切的生产方式，使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手里的状况，越来越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决定经济命脉的地方成为现实。资产阶级法权越来越膨胀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生产组织中，是特权指挥者、特权管理者、特权支配者。资产阶级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也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抓生产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抓生产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与其说他们关心生产，毋宁说他们关心对产品的支配，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供他们穷奢极欲地挥霍和享受。他们抓生产的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想出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大搞管、卡、压，对人民群众实行糖衣砒霜和带血刺刀相结合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只许人民群众“三老四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奴隶般地服从，当牛做马，不许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进行监督。他们专横跋扈地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特权。他们通过任命制等达到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又通过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达到强盗式固定化霸占一切。他们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和支配者。他们把权力当作资本，愈来愈强化资产阶级

法权。他们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工资等待遇高于一般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利用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关系，仗恃他们手中的特权所进行的榨取。官僚主义者阶级愈是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和对劳动产品的监督权管理权支配权，他们就愈能贪污、挥霍、盗窃、化公为私、行贿受贿，他们就愈能在无深无浅不计成本的报销单中鲸吞人民血汗，他们就愈能在“照顾关系”等名目繁多的花样之下营私舞弊，大发横财，他们就愈能吃“送上门”。分工使劳动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马恩选集》第三卷 309 页）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用手中的特权，或直接攫取，或打着协作的旗号，私相交易，以物易物，以这一方面的“关系”换取那方面的“关系”，以开这一个“后门”换开另一个“后门”，因而使他们可以无不占有，因而使他们集体占有整个社会财富，合伙分赃吸工人农民的血，成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性，贪婪地侵吞社会财富，压榨劳动人民。私有制使地主资本家在消费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到自己的“老本”，而所谓“公有制”却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财产无形地藏身在“国有化”和“集体化”之中。公家仓库实际上是他们的私仓，国家银行实质上就是他们的私人钱庄，高等学校不过是他们自己家的私塾，工厂农村一切企事业单位更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资产”。他们在“慷慨地”挥霍这些财产的时候，是根本不计血本的！同时，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利用社会分工的需要，大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把他们的六亲好友，心腹爪牙尽可能安置在工资高、条件好、环境宜人、油水丰厚或所谓“关键性”岗位上工作，不管他（她）们的品德才智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于是因人设事，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一个茅坑数人占，干部队伍日益大大过剩，蠹虫成群为患，使整个社

会因家庭间分工的不同，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新的显著的不平等。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力图使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成为世袭，永恒地存在下去。他们贪图舒适和安逸，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固定化地脱离了生产劳动，生活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过的是寄生的、腐朽的、典型的剥削阶级生活。与他们固定化垄断权力相应的，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在他们僵化的头脑中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全部货色。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们拼命地神话党、拼命地歌颂和吹嘘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汗马功劳，拼命地强化官僚军事机器，拼命改变军队、监狱、公安机关、法院等专政机关的性质。他们醉心于建立他们在台上咳声嗽、劳动人民在台下鸦雀无声吓得直打哆嗦那样一种法西斯专政的秩序。他们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神话党就是神话他们自己。他们正是通过神话党的领导来歪曲党的领导。他们法律是“我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一元化的领导，”就是朕的领导；谁反对朕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应该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或者干脆请他吃几粒花生米！”他们完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野蛮地残害、监禁和屠杀劳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马列。可是他们却更为卖力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口号以欺骗群众。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凡谈“革命”没有哪一点不在装假，搞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什么革命传统，什么无产阶级利益，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一心一意追逐的是他们的私利，是特权！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新型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阶级，“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内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盘踞要津的大党阀、大军阀，大官僚。这一小撮当权派头子更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最凶恶、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敌！官僚主义者阶级当道，就是嗜血成性的豺狼当道，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猛兽当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超等剥削——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是超等压迫——残暴透顶的奴隶主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

（3）主管阶级

主管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管家。党委一级的副职以及在基层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即在此列。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主义者级，享有相当的特权。在他们的主管职权范围内捞点油水，或在主管之间彼此进行交换互相走走后门，都有很方便的条件。而且他们对于上升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也仅只一步之差。因此，他们本能上是依附特权、依附进行“一人化领导”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他们在本质上也带有特权的烙印。但是，他们接触实际问题比官僚主

义者阶级要多一些。当着他们遭到“一人化领导”的排挤、打击和专横跋扈掉压制时，他们内心也会有不满，有看法，有一定的革命性。其右翼追随官僚主义者阶级，充当鹰犬和帮凶，持反革命的立场，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拼命维护反动的上层建筑，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其左翼往往怀着补天之愿，对现状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着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对于他们要达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目的有妨碍，对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所冲击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在新的危机和斗争面前，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权衡失，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计较利害。他们不是在为人民的目标下献身人民，而是在为自己的目标下提到人民。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冒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的改良主义是在不违背“一人化领导”、不触动社会存在根本问题，不改变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这种改良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又必然招致官僚主义者阶级顽固派的仇恨，所以是有极大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当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主管阶级肯定是会发生分化的。右翼成为反革命，左翼却可能转入革命的阵线。应当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感召力，由于共产党本身的革命遗传，由于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推动，不但主管阶级的左翼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少数左倾的人，也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争取他们发生这样的转变，对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4）小资产阶级

小干部、小市民、小知识阶层即属此类。如国家机关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企

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员、医生、中小学教员、学生界、商业工作人员，以及一部分握有一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工人如汽车驾驶员、合作餐馆工作人员等，一部分受过一定文化教育有点手艺现实生活状况具有中农上中农水平的农民等等。所有制的变化，并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阶级性有太大的改变，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队伍消失了，而是使其增加了。

他们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受特权的荫庇，有外快可捞，有“后门”可走，有“关系”可拉，或工资略高，子女有出路，生活上比较宽裕的。这种人不但礼拜赵公元帅，更敬重姜子牙的打神鞭，希望自己有朝一日登上封神榜，上升到主管阶级的地位。他们仰承“一人化领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鼻息，秉承主管阶级的意旨，唯唯诺诺。他们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生产关系的统治机器面前发抖，“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选》四卷合订本第5页）

第二部分是虽无特权可仗恃，但尚有资产阶级法权可利用，有门路可走，生活上一般过得去的。他们也想发财，但姜太公准许赵公元帅向他们开放的门路有限。他们知道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权资本，他们想攀附上去取得一点特权，可是封神榜上老不登上他们的名字。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特权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感受到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必须多动脑筋，时时小心注意人事关系。逢年过节，该送礼的地方得送礼，该请客时得请请客。这样方能走一点“后门”，能拉一点“关系”。他们对上级面子上绝对都巴结着一点，内心里也有不满，遇机会也会发发牢骚，骂声“贪官污

吏”“走资派”。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是反感的，但对于反党阀反军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十分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对革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特权制度的命，同样也会“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同上第5—6页）

第三部分是既无法权可利用，又无门路可走，工资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生活在下降的。这一部分人的革命性非常值得重视。他们的经济地位既已十分苦寒，债务丛增，负担渐重，老婆孩子问题一大堆，物价天天涨，工资年年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看得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主管阶级以及和自己同类阶级但有特权荫庇有法权可利用的人的生活状况，相形之下，更使他们倍感凄凉，确实大有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感；他们所受教育程度又使他们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真理，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对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仗势欺人，弄权吃人的现实，早已不满，精神上感觉到深受压迫的很大的痛苦，渴望早日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修正主义特权制度，渴望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渴望民主、自由、平等，心情十分迫切。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前，“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少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同上，第6页）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经验已经给予了证明，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大多数，会抛弃改良主义的羁绊，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热情传播者和实践的积极投身者，将充分发挥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各个斗争过程中把自己改造和锻炼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对这一部分人一如既往是寄以厚望的。以往大

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此也曾给予了证明。毛主席指出：“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同上第6页）这在今天，仍然是没有疑问的。

（5）半无产阶级

所有制的改变也没有消除半无产阶级。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的半无产阶级包括：

- a、现实处于下中农、贫农生活水平的农民；
- b、城镇街道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

这里所说贫下中农，绝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划定的成份，而是依据现实的生活水平所作的新的衡量。我国解放初期到现在的近三十年时间，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化已是十分之大。有的原来的贫下中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的农奴时代的大地主恶霸，成了新的领主、新的庄园主、新的奴隶主。农村大多数居民，包括原来和他们一条线上的大多数老贫下中农，不过是进一步做稳了他们的奴隶罢了！农村两极分化之严重，由新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新的农奴阶层即新的贫下中农境遇之困苦，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终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田间肩挑背扛当牛拉车日晒雨淋，不做一天的牛马，就不分一天的口粮，就没有一天的盘缠。年终分配，粒粒可数，含辛茹苦耕种出来的粮食，公粮、“余”粮、“爱国粮”、“忠字粮”、派购粮……量来量去二三月就断粮！官僚主义者阶级迫使他们按国家牌价“出售”最好的粮食给“国家”，又按高出国家牌价数倍的价格从黑市买回口粮。他们终年难尝几次肉味，全家老小冷一把热一把喂出一只猪来，

得交售一半给“国家”，并且还得上重达三元钱的屠宰税！就以税收来说，除了像这样明显的税收如屠宰税、粮食税、烤烟税、市场交易税等外，大头在暗处。成堆脱产、半脱产的基层干部和人员，如大队正付支书、正付大队长、文书、民兵负责人、民兵小分队、治安委员……等等，以及成批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这些人多如牛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都转嫁在了新农奴新贫下中农的身上，集体账本上一刀切除。生活中必须的日用品如肥皂等他们必须拿鸡、鸡蛋等一类农产品——无论你自产或去黑市高价买来交给供销社才能换到。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在官僚主义主义者阶级当道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经年不公布账目，甚至多年不能分红，整个生产队工分、粮食、副业收入等财务状况，群众一无所知，工分高低完全由领导一句话，分工好坏更是凭领导好恶喜怒而定；分价值之低，做一天牛马活，仅获三、四角，差的地方则只能分到一、两角，好一点的可分到五、六角以上，条件最好的地方可达一元以上的，那已是极少极少的地方了。他们和高级官僚的正式的工资相比较（不算比此工资高得多的油水），悬殊竟达一二十，二三十、五六十、六七十倍！而且这点点微薄的血汗钱要支付全家生活所需，从一块盐巴到疾病医药。遇有病痛，好药好针水除非出高价从黑市购买，否则只好干瞪眼看着有权势的人家“一元化”！参工、参军、参政、上大学、开拖拉机、做赤脚医生等等，更是根本轮不到今日没有特权靠山的新农奴贫下中农及其子女身上，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注定世袭他们的地位的了。荒年暴月、青黄不接，告贷无门，国家发放的返销粮、救济款也往往落不到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新农奴贫下中农的身上！真是养猪的吃不上肉，种谷的吃米糠！他们想开点小片生荒吧，又怕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挨整，他们想出外卖点劳动力为生吧，更面临

一人做事、全家受累、不分口粮、没收房子、加重罚款、家破人亡的威胁！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就是注定要忍受现代乡保甲长的敲诈勒索，就是要任凭新地主、新恶霸、新农奴主残酷的蹂躏，他们尝够了划地为狱，插翅难飞的味道。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生产关系，对社会分工的如此不合理，早就怨恨冲天了！城镇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无靠山无门路找不到固定工作或正式职业的失业者，帮人打短工，搞缝纫，做泥木工，当搬运夫，修修电筒锁钥，或学点中医，挖点中草药，行点针灸。此类人粮食虽有国家定量供给不愁天干下雨，但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又为住房问题所苦，整日愁眉苦脸，提心吊胆，也担忧人家在“大批资本主义”的时候将他取缔和打击。他们的福利事业官僚主义者阶级无暇过问，但对他们的劳动价值却很注目。他们最后被组织起来，但条件就是在“上缴积累”的名义上，官僚主义者阶级将他们的剩余价值尽行取走。他们的地位与新贫下中农的地位很接近，思想往往受小生产的局限，但对打倒特权，革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命，他们也是赞同的，“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同上，第7页）

（6）无产阶级

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工人队伍有了很大的增加。虽然他们被所谓“条条”“块块”的工业分类分成了不同系统的工人，形成了有一定程度差别的中央企业工人，地方省、市、专区、县企业的工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连自身的劳动力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已被彻底剥夺，成了纯粹的无产阶级，他们本身绝大多数既无法权可利用，更无特权可仗恃，一切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的安排和支配。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下，无产阶级在政治

上完全丧失了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因而主人翁的权利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的主张和看法，既不能实施，也缺乏公开地坦率地表达的场合和条件，他们的思想被官方的舆论宣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能根据官方的调子去说，只能用官方的有色眼镜去看。不然的话，他们的思想言论，就有被当作“反动”思想言论，被当作“异端邪说”受到专政的危险。整个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不可忍受的压迫。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剥削下，在“有权的吃权，没有权的凭关系，没有关系的吃空气”，“送上门，走后门，没有门”的权势门路社会里，无产阶级没有门路可走，没有关系可拉。他们在经济上工资普遍很低，长年不得增长，而家累日重，物价日贵，劳作日紧，体力消耗日甚一日，往往未到月底，工资早已用完，寅吃卯粮，负债累累，生活日益窘困。很多工人夫妻双方分隔两地，家庭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鳏寡孤独地了此一生，更不用说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子女前途升学就业问题不能不令人悬心牵挂了。他们的福利事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可悲，在麻木之时固可无动于衷，中夜觉醒，不禁长叹！很多工矿的食堂，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营私中饱的自留地、克扣粮食，克扣油盐，工人吃的是大锅猪食菜，喝的是缺油少盐白水汤。这种生活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体验不到的，他们关心的是下达任务要紧凑，生产任务要落实到人头上，生产指标定额要追加，上缴利润剩余价值越多越好，工人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知埋头干活越好！这完全是马克思所描绘的那幅吃人图画的重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200页）

这里只要把“货币所有者”改成“特权所有者”，把“劳动力所有者”改成“有劳动力而无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就行了。然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改变！无产阶级竟然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更彻底地剥夺了！无产阶级似乎又回复到从前的命运上去：“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马恩全集》第二卷 404 页）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他们的被彻底剥的，他们已经反抗了，用普遍消极怠工即变相罢工的方式，甚至尝试着用过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方式。现在，整个无产阶级在觉醒之中，他们正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斗争！他们依然“特别能战斗”！（《毛选》四卷合订本第 8 页）他们越来越明白，既然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造成了无产阶级被迫固定化无权，被迫丧尽人权，被迫要变成牲口，那么无产阶级就只有彻底剥夺剥夺者，只有改变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夺回自己的权力！“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的怒吼将更加强烈、更加响亮地震撼整个社会。

形势正是如此：“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马恩全集》第二卷 587 页）

（7）“黑人”无产者

“黑人”，这是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里的特殊产物。那些没有迁移户籍、没有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配给的人，统称“黑人”。这部分人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正当职业了。他们之所以成为黑人，有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触

犯了社会，有的则是纯粹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迫害。他们的生活有的依靠小手工业，有的依靠做点小买卖，有的则属流氓无产者之流。虽然个别“黑人”因投机倒把致富，但在政治上也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选》四卷合订本第9页）。

（8）新形势下的敌我友及其前途

总而言之，新的阶级关系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关系。在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一切仗恃特权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维护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反动生产关系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

主管阶级的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但同样要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革命队伍的阵线。

最后，仍如毛主席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选》四卷合订本第9页）

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上，确信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人数极少的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死硬分子。

官僚主义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权力在少数人手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特权的形成和膨胀。

而特权的生存条件是神话党并通过神话党来奴役劳动。神话党和奴役劳动又完全建立在社会法西斯特权专制制度之上。

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人民却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唤起了不可抑制的新的阶级觉醒。政

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已经使人民高度组织起来了，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正一天天启发着人民考虑自己的地位，正一步步准备着暴风雨的到来。

官僚主义者阶级同样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将神话打破了的话，那么，对神话的再塑造，只不过是准备让人民将神话彻底粉碎。

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第七章 危机

一、基本矛盾的不相容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劳动者和阶级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大变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 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一步调整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路线。

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体制，进一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显然，这是一条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

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一。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当此之时，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二、改良主义行不通

1、行不通的原因

既要维护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又不敢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在枝节问题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的这样一条路线，叫做改良主义路线。然而，这是一条从一开始就注定行不通的路线。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如上一节所说，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列宁说：“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列宁全集》29卷471页）改良主义路线，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用年轻人一定胜过年老人进化论来冒充辩证法，代替阶级论，以强调精神变物质来冒充唯物论、代替存在决定意识；用形而上学的斗争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辩证的斗争方法。改良主义对付修正主义的方法不是强有力的斩草除根的治本的方法，而是一套隔靴搔痒、割韭菜、摘蘑菇、打强心针、吃止痛片、服鸦片的治标方法。这套方法不过是使总崩溃变为逐步瓦解过程的方法。在顽固不化、盘根错节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面前，在空前激烈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改良主义路线的前途，不是投降，就是毁灭。

2、改良主义者

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发端于统治集团中的左翼，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受着现实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反映着社会主义受现有生产方式

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的彷徨和徘徊。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多少有别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他们感受到不变不行的压力。但他们的所谓变，是在维持旧质稳定性、维持旧统治秩序目标下的细枝末叶的改良。他们也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认是发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里呢？他们要么是真的摸不准，要么就是摸准了不敢触及。总之，他们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试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医得好病吗？在急需动大手术才能拯救生命的情况下，延缓手术就等于死亡！而仅仅依靠强心针是不能治愈重病的。

在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我们并不排斥。有的时候，止痛和注射强心针是必要的。

但是，治病只懂止痛和打强心针，乃是庸医所为。很多病人就坏在庸医的手里。

在急剧的社会变革面前，以包医天下的面目出现的改良主义者，就正是这样的庸医。他们不能超越常态，他们不敢打破常规，他们不知病根何在，他们医皮毛不医根本，他们要切除“癌细胞”，但不懂“癌细胞”产生的根源和活动的规律。改良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有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所设计的继续革命的蓝图，也好似傅利叶的法朗吉！此类改良主义者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性。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小生产的劣根性，一方面有革命的狂热性，一方面“思想容易右”。他们患得患失，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流着三尺长的口水。他们能够为了现在牺牲过去，却不敢为了将来牺牲眼前。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使

他们不能“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敢“争取到最主要的东西”，“不敢作任何冒险。”他们的斗争是“毫无策略”的“跪着造反”！他们不懂得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把持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既脱离了人民群众，又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一到决定关头，官僚主义者阶级定将把他们浸入血海！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进行争取改良的斗争，即争取改善劳动者的状况（虽然政权仍然落在统治阶级手中）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用改良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的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反对修正主义》136页）随着改良主义路线的毁灭，改良主义者必然发生分化，大部分会左转站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上来，也有一部分会沦为逃兵，极少数则会右转去做投降派，助官厅剿方腊。

3、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

主要在于它撕开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面纱并形成了“‘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列宁全集》第31卷66页）的局面。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以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马恩选集》第三卷306—307页）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的时候，改良主义没有能够及时采取这一步骤，而是一方面强调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因而也就等于否定特权的统治，一方面又强化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一元化领导”，因而也就等于强化劳动者的奴隶的无条件绝对服

从物的地位。这样，就进一步将劳动者本身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从而也就使整个社会生产置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其结果就是必然加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恩选集》第四卷 483 页）改良主义者没有找到叉路口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因此他们不能使既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解脱。改良主义既要公有制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能有效地排除修正主义上层建筑对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和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可以宣告破产，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既不能解散，还得由国家养起来，吃“大锅饭”。“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马恩选集》第三卷 350 页）劳动者自主劳动的主人翁精神向谬误方向的转化，或者使积极干预被迫走向反面，就是自觉不自觉的消极的反抗——变相罢工似的——普遍怠工。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生产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的紧张，日用百货缺乏，国计民生受到影响，物质生活的供不应求，加剧了社会矛盾，使不满情绪普遍增长，势必危及政权的稳定。改良主义虽然给修正主义的上台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促使革命者对真理作进一步的探求，但是毕竟难于阻止受现有生产方式内在特点支配的社会演变。

三、修正主义侥幸的机会和渺茫的前途

1、修正主义上台有了可乘之机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实质上是因为权力被腐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成为矛盾混合物并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因而破坏了生产力所造成的。但是，从表面来看，却似乎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干扰”而导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嫁祸于人，可以据此骗人骗己。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一；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挥霍和剥削，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担子日甚一日地沉重起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长期毒害和欺骗宣传，小生产的近视，小家庭的局限，使相当一部分人渴望改变眼前物质生活的窘困状况，甚于考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迎合这些人的心理，打着发展生产、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物质需要的幌子，“名正言顺”地绞杀反修防修的革命运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二；

作为矛盾混合物的劳动者，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自身矛盾的出路。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经过自身的实践经验，广大劳动者都明确自己只能是口号上的主人，现实存在中的奴隶，因此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把要真正当家作主的热情，转变为盼望增加一点工资以解决一点实际生活问题的低要求。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投其所好，利用劳动者本身尚有的商品属性，用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计件工资一类糖衣砒霜，重新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热情。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三；

无论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或是改良主义策略下的革命，由于没有抓住叉路口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因此对于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判都是不彻底的，既未触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更未用切实可行的代替方法取代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滋生繁衍修正主义的温床。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远远未确立下来。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四；

使修正主义制度成为现实存在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官僚主义者阶级，其根基不但未被动摇，其体系反而在“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大红伞下，盘根错节地扎根在整个社会上。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和操纵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权。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性，使官僚主义者阶级人数虽少，能量极大。官僚主义者阶级握有重权，居高临下，地位主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五；

整个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得心应手的专政工具，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话党，实质都是为修正主义服务，本能都是趋向修正主义的。这样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作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六；

上层建筑和政治结构，事实上早已迫使人民群众和政治分离，广大人民群众无权无力无法有效地与闻和干预政治，甚至广大共产党员也无能与闻和干预上层统治集团政争的内幕，他们只有在事态发生后听候通知的份，没有在事变过程中表示意见的权力。与当权者相反的不同意见，既没有公开表述和讨论的条件，更没有进行试验的场所。庞大的暴力机器使下面暴发骚乱的可能性小于权力中心的角逐可能形成的统治危机。权力的垄断性，权力之争的诡秘性，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性，既造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必然性，又形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合法保障。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的阴谋诡计和朱可夫的官僚军事暴力相勾结，利用对党的神话和整套国家机器的暴力，实行和平的反革命的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一下子”异化成修正主义社会的最危险和最主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总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逝世前后寻找表现时机，使用这样的方式和时机的条件已日趋具备。修正主义很可能通过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一下子”生出来。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八。

等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他八十二岁诞辰夜不能寐时所作的这一结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

2、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革命力量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确实已经筑起了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因此，即使修正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得逞于一时上了台，注定也是不能长治久安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明确指出：“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更何况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验和锻炼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普遍炼出了识别修正主义的“火眼金睛”，已经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和生活感受，认识到了新的阶级关系的

的变化，提高了新的阶级斗争的觉悟。中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培养出来的斗争精神、革命意志，是反修防修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不是修正主义可以轻易一刀砍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也绝不是修正主义可以随便摆脱的，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论述，像紧箍一样紧紧地套在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头上……。所有这一切，是苏联赫鲁晓夫们没有碰到过的，而这也正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个致命的问题。

（2）十亿人口强制性的生产和主动性的消费

第二，中国人口骤增猛涨，其数已近十亿，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问题是每人每时都面临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大问题，显然只有依靠发展生产来解决。但在不是自由竞争而是高度依附权力的政经一体化垄断生产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又首先取决于政治的清明，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解放劳动者的创造力。但是，同样显然的是，修正主义制度恰恰是扼杀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是被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垄断权力所专制和压制住的，这怎么能够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呢？纵然，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用糖衣砒霜和带血的刺刀把生产暂时刺激起来一下，但是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其时间也肯定是短暂的。在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把持下物质刺激这一套，只能起恶化社会矛盾的作用，只能是修正主义的榨油机。这一套之所以被毛主席所否定，正是已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实践所证明是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况

且，十年来对这一套的批判，已经使劳动者对其恶果的感受不是麻木的而是敏感的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将劳动者的主权剥夺殆尽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取消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野蛮专横地压制住，但是却不能阻挡广大劳动人民对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的需求；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专制住广大劳动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却抑制不住他们本身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压榨的贪欲。官僚垄断特权在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肯定是难得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马恩选集》第一卷 263 页）十亿人的生活问题及其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所没有承担过的巨大的压力，也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致命的问题；

（3）僵化的国内政治，箍紧必炸

第三，中国和苏联的社会结构不尽相同。苏联是一个半欧洲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没有中国严密，因此，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缓冲余地。它有成文的法律，有一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一类持不同政见者还可以发表反对意见，举行记者招待会等，对政治犯不采取屠杀的政策，教育制度也使人们多少有一点能够凭自己的才智得到深造的可能，学术方面也不强求划一，而是提供条件允许并鼓励自由讨论、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做法能够使社会上具有才能的人们有一定的奔头和出路，使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从而使革命运动缺乏敢于牺牲一切的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则不然，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实行现代法制，而是实行封建专制，变化性灵活性很大的政策，迁就应付临时事件，凭官僚

主义者阶级的“一元化领导”的好恶喜怒执行政策，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对所谓“反革命”或格杀勿论或施以重刑，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等都不器重人才，而是凭关系，看门阀。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把持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社会的矛盾冲突缺乏缓冲的余地。千千万万优秀人物愤懑不平，渴望变革，被迫敢于铤而走险，要从绝路中闯出生机来。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同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长时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特权的过程中，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义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领导集团的日益僵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内部日益僵化，孕育着总崩溃的到来。这些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致命的问题。

(4) 面临地方造反的现实威胁

第四，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布满了诸侯、藩镇、军阀割据混战的记载。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而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诸侯，新的藩镇，新的军阀雄踞之势。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里，这种局势曾是动乱的根源的话，那么在反修防修的历史任务已经明确，在毛主席已经发出了要地方监督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的号召之后，这种局势却有可能转化成为粉碎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阴谋的积极因素。每块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完整的地域，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现成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潜在的危险。

(5) 在国际交往中承受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

第五，在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即使修正主义通过出卖中国的资源和工业原料换来了大量外汇，但为了保持政权，也要以相当部分花

在消费上，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是有限的。不但中国人民不容许把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任凭官僚主义者阶级出卖国家资源做工业国的附庸，而且国际竞争势必把中国抛在后头。这种状况也必将影响和改变国内结构。当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人权运动已在苏修及东欧一些修正主义国家的后院里，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的前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人民的视野也在一天天开阔起来，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普及，人民的耳目也越来越灵，思想也越来越发达。国际民主潮流势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强烈的反响。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6) 人民决不会容忍下去

第六，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最重要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修正主义路线本身所具有的反动性和反人民性。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趋向光明的解决，而是使这个基本矛盾趋向黑暗的恶化。因而它不得不继续接受这个基本矛盾的支配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它把公有制社会生产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它用强力推行一条特权专制的路线，利用劳动力还具有的商品属性，鼓吹“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以小恩小惠作诱饵，蛊惑人心，“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

（《马恩选集》第一卷 385 页）从而实质上加固劳动者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奴隶地位。也就是说，修正主义路线恢复劳动力商品性质的活力，是为了将劳动者进一步推入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就范做稳奴隶的深渊。它对于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则决定性地要予以毁灭！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人民性和反动性，决定了它必然遭到具有反修防修意识的全体人民的自觉的反对和坚决的抵抗，这是毫

无疑的。

(7) 回光返照不久长

总而言之，任何欺骗都是不能持久的。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命运，绝对不是什么幸运，而肯定是厄运。在今日中国，修正主义即使上了台，其统治地位也是不能长久的！它的“一下子”得逞于一时，不过是预示着它的必然顷刻瓦解！愚蠢昏昧的人迷信于眼前，智慧明达的人却着眼于未来。修正主义制度不过是整个剥削阶级制度的回光返照。在今日中国，其做法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其前途也将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马恩选集》第一卷 274 页）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决不会容忍的”！

四、生死关头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1、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

作为人的体力和脑力总和的劳动力，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生产的基本因素。没有劳动力的参与，就没有任何生产活动。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性质的变化对社会性质的变化具有强烈而敏感的反应。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变为商品，不将劳动力变为商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和压迫方式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471 页）修正主义将劳动力的所有权从劳动者身上剥夺，使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不将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

物，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特权专政的超等奴役压榨制度就不能建立起来。修正主义的生产就是奴隶制度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体系中，“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和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马恩选集》第四卷 164 页）共产主义将劳动力变为主体，不将劳动力作为主体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鸿图就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一卷 273 页）

由此可见，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掌握这一原理，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斗争的实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围绕着解放劳动还是奴役劳动而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正如同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那样，劳动力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自身矛盾的出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究竟是把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净化为主体性质，还是恶化为奴隶性质，究竟是把社会引向真正的完整的社会主义，从而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境界过渡，还是把社会推入修正主义的黑暗深渊，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旧有形式已经很难恢复，由于社会生产的高度组织化，劳动力也很难倒退到纯粹商品性质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劳动力的本能是强烈要求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摆脱矛盾混合物的处境。而统治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所掌握的上层建筑却要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和惯性，把劳动力完全沦为官僚的奴隶以便于驱使。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基础。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一切以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生产上、分配上、社会上都切实地、而不是虚伪地确立和增强劳动力的主体地位，这就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放劳动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终将要取消劳动力商品属性，但是社会主义阶段虽限制却也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质，而不是就否认它或扩大它。这条路线，对劳动力的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的奴隶性质，则是决定性地要加以根本否定。这条路线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就在这里。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就不但是只着眼于生产工具，“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 31 页）而且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掌握生产工具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的身上，用自主的热情的劳动代替强制的被迫的劳动，用解放劳动者的方法解放生产力，努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与此相反的，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基本的经济规律，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所阐述，在此即不赘言。必须指出，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根源。只要劳动力这种矛盾混合物的性质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不会有一刻的停顿。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3、不利于革命的斗争方式

但是路线斗争又集中表现在权力之争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权力之争的重要意义：垄断政权就能

垄断一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既然整个国家的军、政、财、文大权都已统统高度集中于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垄断，既然早已排除了另外的政治组织通过合法的途径与共产党争权的可能和存在的余地，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共产主义事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马恩全集》35卷380页）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已是如此，共产党在长期固定化执政后更是如此。权力愈重，利害关系愈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就愈尖锐。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当权的官僚主义这阶级。但是，共产党内的权力之争不是诉诸于人民的裁决，而是决定于其上层内部的倾轧。诚然，共产党是一个有革命理论信念、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一个具有革命遗传的党，特别是当党的领袖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党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定会坚决抵制修正主义，抵制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是，毕竟由于少数人长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政权，已使党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党内“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当权人物，已经蜕变成了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养尊处优，不读书，不劳动，不调查，不研究，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脱离实践，做官当老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二卷194页）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特殊地位，使他们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官僚主义者奉权力为偶像，迷信权力，崇拜权力，唯权力是从甚于坚信路线，他们的信仰就是权力，是标准的权力至上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性无比贪婪，无比凶狠，无比阴险；他们的眼界毫无历史感，近视而无远见，昏昧而不能明察。为了

夺取权力，他们会不惜一切，任何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任何阴谋诡计都会使出来地去谋权、篡权、夺权，使权力之争具有了极不平常的险诈性和残酷性。正因为党内这种情况，正因为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整个上层建筑本能趋向于搞修正主义，正因为国民经济陷入了停顿和濒临崩溃，正因为修正主义上台有了可乘之机，正因为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和条件，正因为不同意见没有公开发表、讨论和试验的余地，正因为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质变，等等，所以致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迈出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时，革命力量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肯定是处于劣势的地位。斗争形式极其不利于革命。显然，在这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不直接诉诸于人民，如果不立即果断地诉诸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危机和修正主义的上台，都是在所难免的。

第八章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

综上所述，“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 482 页）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变更的阶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上层建筑变革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从时间上说，第一阶段在中国大约从 1953 年—1963 年，相当于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运动到人民公社化及为巩固人民公社而斗争的这段时间，第二个阶段在中国则是以对苏大论战为起点，从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来的。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反修防修实质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只有从对私有制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从私有制的全部锁链下得到解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加以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恩选集》第二卷 194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 年爆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 1956 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在上面《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节文章里，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整个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开端，在具有“开端”的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开端”的局限。

这种局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在当时是不能苟求的。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象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一如从前，“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马恩选集》第三卷 66 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展开的“文艺革命”、

“卫生革命”、“教育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上海一月风暴”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是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尽管显示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影子（例如从舞台上驱逐帝王将相、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等等），但毕竟远未能够完成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任务。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就以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而言，从打破剥削阶级一统天下的正确的革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沦落到了新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营私舞弊塞私人凭关系走后门的境地。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推荐和选拔的新形式，充满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玩弄特权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旧货色！又例如“卫生革命”，向改变城市大老爷卫生部的革命目标前进的步伐，结果却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领导下，踏入了城乡大小老爷合伙营私舞弊服务部的泥沼。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控制下，从“赤脚医生”的人选，到治病发药，不少合作医疗不仅实为“官医”，而且变成了合法走私的“医院商店”，账目不公开，药品囤积居奇，据为己有，投机倒把，甚于奸商。如此等等。在总问题没有解决，总根子未曾

触动的情况下，一切改革都是虚话，陈旧的东西不但会力图在新形式中复活，而且简直是在新形式的躯壳里找到了最适宜生存的条件。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但是，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革命的，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与和投身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系列反复、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深入持续达十年之久，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现存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展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广阔的前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对党神话，撕开了假社会主义的面纱，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马恩选集》第二卷 194 页）少数人对权力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把所有制管理的专制形式膨胀为极端专制的新的特权压榨手段，强加于公有制社会生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已经重申：“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马恩选集》第三卷 333 页）

公有制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改变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方面的严重的弊病，权力分工必须由绝大多数人即由整个劳动人民来左右。为着谋取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必须首先争取使每个社会劳动力都得到解放。“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共存。”（马克思《法兰

西内战》，见《论巴黎公社》第 56—57 页）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不含糊地揭示了，应当打碎从前的官僚军事机器，“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同上，55 页）“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同上，《马恩选集》第四卷 392 页）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走资派的手里转到跑资派的手里了！再不能把权力让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下去了！这种垄断，已经形成了更无人道的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形成了更贪婪、更狡诈、更毒辣的新的剥削阶级，已经形成了更黑暗、更残酷、更罪大恶极新的剥削制度！“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马恩选集》第一卷 15 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生产力的桎梏。要改变这样的生产关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论巴黎公社》136 页）；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积极进行。

五、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

1、一般准备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恩选集》第二卷 195 页）

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确立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好了组织准备。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所造成的恶果和激化的矛盾，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定的必要的文化水平。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近六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苏联变修的惨痛的教训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为发展反修防修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依据。

2、主动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次解放使他们充满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则是使无产阶级从思想的牢笼里又获得了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们坚定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使他们对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具有了皮和肉的感受。麻木中的痛苦无知觉不痛苦，感觉到的痛苦更痛苦。过去的痛苦只留下了疤痕，现实的痛苦却刺激着每一根神经。无产阶级从丧失一切、固定化没有一切中，认识到了他们更彻底地被剥夺，因而准备更彻底的剥夺剥夺者。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胸膛里充满了仇和恨的怒火！无产阶级已经看清必须进行第二次更猛烈的血与火的清算的对象，已经不是从前的剥削，而是如今的剥削！无产阶

级已经不是从感性、不是从宣传中得到启发，而是从自身的政治实践经验的感受中，更为牢固地掌握了真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都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一卷 385 页）

3、所有现存制度都在钻牛角尖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遭到窒息和扼杀的命运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苗头却在资本主义世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里酝酿着破土而出。资本主义世界在炫耀其“民主、自由”的时候，却遭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无情的挑战。修正主义国家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人权运动却揭破了它的残酷和黑暗，暴露了它和人民尖锐对立的困境，在“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乐曲声中，却声声听得出修正主义鬼魂的哀嚎。整个世界的社会制度都在其自身内在的弊病支配下钻牛角尖，走死胡同，因而整个世界都在渴望，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出现，都在孕育着新的生命。而战争的阴影，使这种渴望和等待变得更为迫切，使这种孕育更加日益临近分娩之期。中美关系的解冻固然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可是在中国难道又没有打开向外窥探的窗户？当中国不断惊人的事件在世界面前接二连三出现的时候，中国人难道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辞职不感到有点什么值得探讨吗？……

4、被动因素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全部完成。革命需要主动

因素，同时，革命也需要被动因素。在“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恩选集》第一卷 609 页）的局面下，无产阶级只有从一系列探索的失败中，才能认准解放的唯一出路。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恩选集》第一卷 393 页）陷于灭亡的是那些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树立起来以前，探求出路的矛盾混合物所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一系列应当摆脱的东西，才能够聚集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而无产阶级要摆脱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实践，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同上，393 页）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由于这个革命已经“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马恩选集》第一卷 393 页）当着修正主义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的放肆的欺骗宣传和疯狂的恐怖政策越来越使人民不堪忍受的时候，当着人民普遍认识到“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马恩选集》第一卷 501 页）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上台对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的时候，当着既要打着红旗就不得受红旗的紧箍限制而生产力更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不能得到解放的时候，当着统治集团内部许多成员也越来越厌烦、越来越不能接受“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反复无

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8页）的专制体制的时候，当着重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加剧的时候，当着革命的领导权已经由改良主义者手里转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时候，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工作全面地完成了！

5、必然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社会主义现存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反修防修的必然要求，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必然发展。

必然的东西一定会变成为现实的东西。“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选集》第一卷488页）任何企图阻止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来的行动，都是反动的行动，徒劳的行动。无论勇敢的螳螂们花岗岩般顽固的头脑有多么大，不可一世的手臂有多么粗，在历史车轮面前，螳螂毕竟是螳螂！任何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定将被历史车轮无情地碾碎！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第三篇 现实性

第九章 基本方针

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就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变为千百万革命分子的实践、变为既牵动整个下层劳动人民、又牵动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改良主义的幻影清除干净，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生动地开展起来，用以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既能前所未有地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又能有效地粉碎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全面地、稳固地奠定基础。

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61 页）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

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确保劳动人民能够真正当权。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能真正地享受到主权，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聪明才智得到应有的培养、锻炼和发挥。领导者只有取得被领导者大多数的同意，才能领导。被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就能光明正大地成为领导者。同样，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不赞同，也能不至蒙受阴谋诡计的暗箭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毁灭的恐惧，平安地回到被领导者的正常生活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使人民大众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将切实保护人民，保护革命，保护一切革命的创造性的见解和活动，将帮助人们打开思想的牢笼，把人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并且依靠这些创造力全面完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使社会早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使人类的注意力早日集注到发展科学、征服自然上来；使人们早日完全享受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职业的自由。建立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对绝大多数人们的未来提供极好的机会，重新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鼓舞起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热情。

简言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防止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国家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唯一有效的利器，是使权力分工为人民所掌握，当权人物和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范围的切实保障。

三、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1、从十月革命以来

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消除弊病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恩选集》第二卷 307—308 页）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可以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六十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从列宁掌握国家政权五年之后在逝世前夕的指示：在我们面前，“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那完全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简直是坏透了的国家机关。”（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集》单行本第 18 页）“关于我们国家机关及改善这种机关的问题，乃是极端困难，远未解决而同时又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同上第 25 页）“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致使我们必须首先切实加以考虑，怎样来与这机关的缺点作斗争。”（同上 31 页）“应当及时猛省。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一切夸耀等等怀着万分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来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

骤。”（同上，32 页）到毛主席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文艺、教育、卫生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鞍钢宪法等等，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思想等等，以及革命委员会等新生事物，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矛盾的弊病，或多或少地显现了解决矛盾和消除弊病的手段，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轮廓。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一。

2、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245 页）“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占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 56 页）

列宁肯定：“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 3 卷 211 页）并指明了这种政治形式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第 260 页）

恩格斯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论巴黎公社》第 15 页）

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二。

3、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

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首要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330页）

“要派遣几个有学识修养而又忠诚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二三年论文集》第37页）“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你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是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列宁全集》第31卷221页）

更为明确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及《国家与革命》中，都曾摘录和引用了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的话：

“‘……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第一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是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各级行政区长官’（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3卷

226—227 页)——尤其必须重视的是,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为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同上,226 页)

那么,美国等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不要官僚制的呢?看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见《1765—1917 年的美国》)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使推翻旧政府、组织新政府的行动成为顺理成章的受法律保护的行动。

这里所谓旧政府被新政府代替,虽然新旧两者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毕竟是一种不断更新或更换的形式。它的存在表明了统治阶级阶级民主的存在,统治阶级的阶级民主显然使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增强。美国正是通过成文宪法,取消任命制、实行普选制、两党制、年度选举、总统任期限制、军队从属于文职当局,等等,尤其是依靠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来做到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

第二点,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

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

美国正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使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互相限制，以权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吗？

形式始终不过是为内容服务的。让我们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马恩选集》第四卷 169 页）马克思也说：“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马恩选集》第四卷第 22 页）等等。

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指示呢？让我们还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列宁说：“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

之一。”（《列宁选集》第三卷 231 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恩选集》第一卷 40 页）“所以我断言——恩格斯说——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马恩全集》第二卷 677 页）

因此，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 38 页），是完全应该的。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问题的几段论述

1、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马恩选集》第四卷 502 页）

2、考茨基之流破产的根本原因

列宁指出：“像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个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初等算术，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84 页）

3、共产主义者的责任

列宁还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

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美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允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略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列宁全集》第 31 卷 85 页）

4、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列宁还说：“一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不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 and 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77 页）

5、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重要

“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

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同上）

6、需要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新形式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中共“九大”文件汇编》第20—21页）

7、新的斗争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还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第74页）

第十章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最高领导

1、党的信任危机

按照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毫无疑问是本国独一无二的共产党组织。

但是，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共产党的惨痛的历史事实，却不能不令人发出疑问：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继续如此这般地奉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应不应该继续如此这般地拥护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

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党的领导，已经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领导，而是马克思主义叛徒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的统治，是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更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共产党，只会把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领导成修正主义的黑色领地。要想使社会主义国家还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必须摆脱、必须推翻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有哪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会抛弃共产党这个称号，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党呢？这种情况从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相反，变修的党将会更加拼命地标榜自己岂止是革命的、简直是最革命的共产党，岂止是马克思主义的、简直是最纯粹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

何况，在任何一个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免不了是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难免执政的共产党本身和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必然并且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处在这种变化面前，人们不能不会考虑：这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

这样，无情的历史就使共产党的组织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信任危机。

2、党的领导不可不要

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如果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拟定《宣言》的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无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语录》第 1 页）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共产党的领导永远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至于成为叛徒搞修正主义。在公有制社会经济基础上和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中，在共产党本身和劳动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的主要敌人已经在共产党的当权派内，并且由于客观存在这个主要敌人正滋生繁衍的现实面前，必须考虑党的领导究竟以什么形式体现才符合实际，符合科学，符合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方向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

3、最根本的不是组织的领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党的领导被视为就是党员的领导，就是党支部、党委、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党组织委派来的人的领导，党的领导一度因此被糟蹋到极端荒谬和反动的地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威风，正是在维护这种所谓党的领导的旗号下，疯狂猖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是现实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澄清了这种可耻的混乱，是整个事态

的演进、披露和发展，是毛主席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指示，打破了对党的神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曾一度瘫痪了，但党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却没有瘫痪，而是更加迅猛地发展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过的中国人民，已经对党的领导这一概念有了正确的认识，广大革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能算作共产党的领导。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产党本身也明确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见《中共“十大”文件汇编》第49页）

这种关于“党的领导”的概念的变化和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亿万人民通过革命实践深切感受到的经验总结。它充分表明了，虽然在白色恐怖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党的组织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旨，往往是相一致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权力被共产党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下，党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即那些党内当权人物集团）往往成了、并注定要成为贯彻和执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宗旨的障碍。因此，党的领导已根本不能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了。

4、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虽然已经明确了党的领导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门浩瀚的学说，并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已多次明确指出，这门学说不是死的教条，而是活的指南。怎样才能使这门浩瀚的学说变成整个社会易于牢固地掌握和运用其精神实质的“方向盘”，怎样才能使活的指南不至于被有意和无意地曲

解为死的教条呢？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纳成简明的法律形式交给人民。

因此，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得遵守宪法，服从宪法，受制约于宪法，逾越者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和制裁。

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

1、两党制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两党的组织领导主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出版物（书籍、报刊、杂志等）来体现。两党的党员不固定，用以打破党派成见。你今天拥护甲党的主张即可成为甲党的党员，明天拥护乙党的主张即可为乙党党员，任何人不得非难。两党的常设机构主要是报刊编辑部。经费由国家平等提供，监督使用。两党负有为国家提出行政正职领导候选人供人民选择的责任。政权由经过普选证明为大多数人拥护的党来掌握。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任何不信仰、不遵守、不服从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的组织、党派，都必须坚决取缔。但是，这种取缔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得到了一个充分贯彻实行的合理环境而自然形成的。在阳光之下，萤火虫没有市场。

2、两党制的好处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选》甲种本第 352 页）两党制为这种比较和斗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形式。与执政党相反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和主张，都有公开表述、讨论和试验的条件和场所，而成文宪法又使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意见、看法和主张都统一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民主和法制之下，让谬误得以公开暴露，从而使谬误失去了藏身之地；让争论由人民、由宪法、由理智来裁决，而不是诉诸于强权，从而使争论确立真理而不至导致谬误。因而，两党制能够使革命合法，使真理受到尊重，使笼罩着一党制权力之争的罪恶的黑暗的无耻的阴谋诡计绝迹；两党制是监督政府行使职权，使当权人物不得滥用权力，使错误路线能够得到及时的和较为顺利的纠正的有效的方法，是防止执政的共产党蜕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奴隶总管老爷党的一个有力的措施。

3、两党制的历史渊源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极好的方法。美国尼克松水门事件已足够发人深思，促人反省。是什么使美国总统不能滥用职权，是什么使资产阶级的总统只能效忠公职而不能违法循私，是什么使权力很大的总统不能不辞职？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吗？不正是由于在这种民主和法制之下实行了两党制，从而使资产阶级的政党只能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而不能作为资产阶级的主宰的缘故吗？更不用问日本

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田中为什么也无独有偶会步尼克松的后尘辞职了等等。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形式，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它能够有效地动员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内部能互相制约、监督，从而使公职人员难以扩大特权难以官僚化。因而对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促进国家机关的新陈代谢，等等，是有利的。在这里是形式帮助了内容，在另一方面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无产阶级能够将资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警察、监狱等等一整套学来，为什么就不能把两党制也为我所用呢？

4、两党制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世上没有独翅能飞的鸟，也没有独脚能跑的人和兽。关于无产阶级也完全可以实行两党制的理论依据，我们还不必就拿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辩证法的原理来加以证明，也不必多所引述，只要指出这一点来就足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马恩选集》第1卷第269页）这难道还不够权威，还不够明白吗？为什么无产阶级就只能有一个政党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呢？须知“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为正因为是在一锅粥里，就会陷于更尖锐的对立之中……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尤其是立意搞修正主义专门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更能“在一定的时机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均见《马恩选

集》第四卷 410 页)

至于如何对待从前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作过巨大贡献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第一国际的态度，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克思所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曾经“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4 页）但是，当“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马恩选集》第四卷 413 页）的时候，恩格斯却毫无缠绵之情地写道：“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马恩选集》第 4 卷 412 页）对此，恩格斯还说：“任何政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不过，老黑格尔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马恩

5、两党制的现实苗头

其一是，在公有制未确立的好些地方，在同一国家未执政的共产党旁边……特别是自从中苏论战以来——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马列）共产党组织。

其二是，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现实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和自己现有的阶级地位，注定了现有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其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群众基本上都分裂成了两大派。这决不是偶然的，同样是现实阶级关系变化的必然反映。除了阶级根源之外，两派成见之深，反映了未经人民表决的自信，两派武斗，反映了缺乏能令人信服的解决争端的民主制度的困恼。

其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军队代表由上级机关调配外，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均系两派群众推荐。但是，这种推荐仍是在一党制的框子之下进行的，人选集注在是否党员，家庭出身是否过硬上。并且，它不是让取得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代表组成责任领导班子，而是让两派对等的代表捏合在一起，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做不成多少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从而使政权仍

然落回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党制特权老爷手中，翻案复辟成了难免之事。但是，革委会由两派群众推荐产生，毕竟是具有两党普选制迹象的一个表现。

其五是，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的出现，更是无产阶级两党制在现实生活中露出来的苗头。这不单单是一个干部队伍臃肿庞大过剩的表现，而且简直明明白白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一部分在朝、一部分下野的状况。不过这种在朝与下野，都不是由人民决定，而是由党内当权派决定的罢了。至于说到劳动锻炼的问题，在一党制下，这种下野锻炼的方式，仍然远远脱离人民，不是到人民中与人民同甘共苦，而是远离人民住进了特殊庄园。等等。

总而言之，“不从根本上开始革命，就不能完成革命。”（《马恩选集》第一卷 15 页）无产阶级两党制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一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无产阶级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掌握两党制、运用两党制，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容忍任何政党把自己的宗派利益、小集团利益，凌驾于整个公有制社会人民的利益之上了！无产阶级只有从政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才能解放全人类！而马克思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三、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基础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每个劳动者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选制，则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基础。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主权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自身。一切权力机构的产生和法律的制定，以及当权人物的任免，都必须征得劳动者大多数的同意和批准。

马克思指出：“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作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作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法兰西内战》，见《论巴黎公社》第 198 页）恩格斯指出：“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马恩选集》第四卷 169 页）“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马恩全集》第二卷 664 页）“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马恩选集》第四卷 508 页）“毫无疑义的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转引自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单行本第 12 页）。等等。显而易见，既然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属于公有制，那么权力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名符其实地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归人民——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机构所必须信守的原则。

四、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上层权力机构

1、立法：人民代表会议制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代表会议与修正主义一党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本质的区别。

修正主义一党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乃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法西斯骗子政治的摆设和点缀，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第一，代表的产生不民主。代表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是由党老爷指派的。第二，代表大会的议案都是由党提出来，并且已基本是由党老爷决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修正主义党

主子强奸民意的一架表决机器，人民只有在“人民代表”开完会后，方才知悉某某位是“人民代表”，方才知悉开过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究竟代表什么人民呢？不堪忍受的欺骗和侮辱！

而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名符其实行使立法权的机构。

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人人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被选为人民代表的资格。

县以下基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完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以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则由人民间接选举即通过下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负有制定新宪法及选举法等急需的法律、法令的使命。其代表名额，应按现行行政区划（中国将来应划为六十个省、市、自治区，取消地区一级行政区划）分配，至少每县一名。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县、市，可考虑增加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及妇女代表名额应予照顾。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由县人民代表会议提名，全县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全年时间应统一作例如以下的安排：两个月在本选区原单位搞好本职工作；两个月在本选区内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本职工作非体力劳动的，必须参加基层体力劳动；两个月外出参观、访问；两个月在本选区参加政法工作，其中一个月做陪审员，一个月作辩护律师；两个月学习理论，研究问题，准备提案，最后两个月参加年度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代表工资，无论何人，均按原单位、原工种、原级别不变，但办公费（包括

法定外出参观、访问的车船旅行费用)全由国库支付。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可相机特约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列席参加。列席代表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由各省、市、自治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选举 3—5 名代表组成,或按比例代表制由选区人民普选产生,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关。常务委员每届任期六年,第一届即平均分为三组,每二年改选总数的三分之一。凡在政府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于其任期内,不能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或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享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当选总统提议审查和任免政府各部部长及其组成人员,制定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对外政策、以及监督和弹劾政府行政当局等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则负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处理日常对外事务、审讯一切弹劾案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授予它的一应职权。

但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法令的提案应呈递当选总统签署之后,方为有效的法律、法令。法案呈递总统后,总统如同意则应批准,如不同意,即应退还,并须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对总统退还的议案,如代表会议经过复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认为该项法案应予成立,则交全国人民审议讨论表决,或交由全国县以上代表会议总人数议决,如获多数通过即为正式法律、法令;也可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会议议决,如获全国省市、自治区代表会议过半数的通过亦可定为正式的法律、法令。对代表会议呈递总统的

法案，总统如扣压迟迟不复，超出一月，亦为有效法律。

但代表会议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等自由的法律。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完全的地方自治，一律取消由中央任命地方长官的作法。

因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代表资格、代表权限、代表产生的法则等，一应可以推及省、市、自治区直至地、县人民代表会议，基本原则对基层人民代表会议亦适用。地方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根据地方当选行政首长的提名，审查批准地方行政机关的组成人员，遵照宪法及中央法律、法令之规定，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具体情况的法律、法令，监督地方行政当局守法、施政、工作效率等情况，负有弹劾之全权。常务委员会处理代表会议委托的工作，负有审讯弹劾的全权。

2、行政：总统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行政权属于总统。仅就字面上讲，“总统”一词显然优于“主席”或“总理”的称呼。“主席”一词，虽然具有主持会议、话让大家说的民主意味，但却显得局限于会议而缺乏行动。“总理”一词虽然具有日理万机富于实行的权威含义，但却又犯包办一切而取代大众责任之忌。因此，比较而言，“总统”一词较能使议论和行动、民主和集中、领袖人物和人民大众统一起来。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执掌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总统，负有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统领人民群众、忠于马克思主义、遵守宪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不断革命的崇高责任。

总统每届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两届以上，更不得终身任职。对总统废止“万岁”呼喊。

总统选举手续如下：

候选人由两党代表大会提出。再由总统候选人自己物色助手提出付总统候选人。

国家对两党总统候选人，平等地、充分地提供一切宣传工具，以便两候选人向全国人民阐述他们的政见和主张，供人民选择。

选举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即由全体享有选举权的公民，根据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所定方式，在全国统一的时间内，选派选举人若干名，组成各省选举团，集合于各省省会，进行投票。选举团清点投票结果，并开具证明书，封印后用飞机经送首都呈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该主席应当在全体代表的面前，开拆所有证明书，公布票数于银幕之上，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计算票数得票数多者即当选为总统。但此当选票数必须超过选举人数的过半数。如无人获得过半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当复选，以得票多者为当选总统。如两候选人的票数相当，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亦应立即投票选举其中一人。

应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当时正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人员，不能被选派为选举人。

凡年满三十五岁，在本国居住达十五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当选为总统的资格。凡年满三十岁，在本国居住达十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当选为付总统的资格。

在总统被撤职，或已故、辞职及不能执行总统职权而去位时，总统职务应由付总统执行。在总统及付总统二人都被撤职或亡故、辞职、无能力任职时，全国

人民代表会议应选举代理总统，至总统能力恢复或新总统选出时为止。

总统工资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法定标准采取供给制，不得任意增减。总统卸任之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但仍具有国家高级顾问的当然责任。国家对卸任总统负有保卫安全、保障生活供给、提供研究经费和写作条件等项义务。

总统就职应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发表就职宣言。

总统为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总统应提出人选，征得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半数以上的同意，选拔各部部长组成其责任内阁，以及任命大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等国家高级干部。此项提名任命手续，应经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用法律加以规定。

总统应随时向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报告国务情况，并应将本人认为所当采取的措施、政策提请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审查议决。总统有权在例会之外于非常时期召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总统应接见驻外使节，应责成各行政部门首长，按时当面或亲笔书面报告该部门工作情况及提出意见，应注意一切法律是否施行，应监督国家机关执行政策的情况和工作效率，并对这一切负责。

总统、付总统及国家机关所有干部，完全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如受违反宪法、结党营私、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等罪过的弹劾时，应予撤换。

上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物的产生方法及其权限，可以类推至省、地、县及基层行政机关。

3、司法：马克思主义法制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并设立的高级、中级和初级人民法院，以及上诉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法官应

精通法律，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相当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品德必须公正无私、刚直不阿。法官忠于职守者，得终身任职，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德才不当者，人民代表会议可随时予以撤换。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应重视政法学校（院）的开办，这种政法学校（院）即等于马克思主义学校（院）。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懂马克思主义，没有辩证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进步的世界观将得到空前的普及，必将大大地有助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在这样的法制之下，律师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均应实行。

但律师不固定，不专业化，各行各业里诉讼双方所请托为之辩护者，即可视为律师身份。

为保障正义的伸张，应绝对废止秘密审判。被告有权自我辩护或吁请人民代表或请托其他社会人士为之辩护。准与被告和告发者或其他证人对质，准予被告提取对于本人有利的证据。没有法定的手续，被告不受逮捕，人身安全和住宅不得侵犯。案件审理不得久拖不办。案件的公开审判应根据案情影响范围之大小，在案件发生地点的行政中心举行。

为避免和纠正案件的错判和判决失当，允许并保障被判决者申诉，并为申诉者负责。凡有高级法院的地方，应设立上诉法院。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应分立。执法而循情走私者，执法而搞逼、供、信、捆绑吊打非法刑讯人者，以执法犯法，罪加一等论处。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有关民法、刑法，以为法院判决的尺度。决不可再听凭所谓的“形势需要”实则为官僚一己之喜怒

哀乐、门路关系一类来草菅人命、玷辱法庭、危害人民了！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法制下，任何人都享有批评别人的权利也负有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批评的义务。诽谤和诬蔑将为社会所不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批评现任总统不仅受到法律保障，而且将受到社会支持，决不会因为批评总统而构成罪案，更不得因为对总统说着一个不字就被残暴地处死！马克思主义法制将把军事官僚的法西斯暴政彻底埋葬。

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基层权力机构

1、工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除了革委会外，还出现了班组长由工人选举和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及干部下基层或工人进驻机关等现象。这些苗头都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阶级要民主，要真正当家作主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厂工人代表会议是工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力的机构。负有制定本厂生产定额、计划、监督厂长及整个管理机构工作情况等项责任。厂代表会议要定期听取厂长关于厂务工作的汇报，检查厂革命委员会的整个工作，等等。

全厂代表名额应根据本厂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于各车间。工人直接选举本车间出席厂代表会议的代表。同样，厂长、厂革委会成员及厂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车间主任，在其任期内不得被选为厂代表。每届厂代表任期两年。

厂代表除会议和必要的学习时间之外，一律不脱产。但在厂代表会议或厂革委会的统一安排下，可到其他车间从事他工种劳动或到各管理部门（例如机关、食堂、商店、医院等）“蹲点”，以便掌握情况、行使监督职能、推动改进管理工

作。

厂的行政权属于厂长及由他提名代表会议多数票通过所组成的厂革命委员会（所谓厂长即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厂长由全厂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厂代表会议责成当选厂长及所负责的厂革命委员会以精简的机构、精干的人员，以高度的效率做好全厂政治思想工作、生产业务工作、财务劳动工资工作、生活福利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等。当选厂长应对上述工作负全部责任。每届厂长及革命委员会任期应以两年为宜。

厂长及革命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如不称职或有违法乱纪行为，厂代表会议有权随时撤换。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特权专制下，书记制专政与厂长制专政完全是一路货色。而在人民民主共和普选制等所组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毋庸置疑，“通过一长制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0卷425页）。

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一律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对工人直接选出的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如无厂代表会议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上级不得随意令其免职。

任何玩弄阴谋诡计，比如以福利主义为诱饵把国家设备、资金用以生产非国家计划安排的产品、用以谋取非法利润、用以拉笼本厂工人获取多数票当选的厂长，是为伪厂长。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会议或向上级行政机关或代表会议或直接向各级法院提出控告。上级领导机关或法院，不得以诉讼双方拥护者多寡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宪法及与之相应的有关法律和事实真相本身，为评判是非之准则。要保护少数，注意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以非法手段

谋取选票、结党营私、贪污盗窃者，必须加重惩罚，诉诸刑事判决。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用法律明确规定和确保工厂的社会主义性质。工厂领导有执法的权利，更有守法的义务。

2、农村

目前在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但将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到大队核算制。

生产队长应当一年一选。每年年终结算分配之后，即行年度总结。在制定来年新计划的同时，比较不同方案，全队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社员直接投票选举新队长。再由当选队长提名征得全队社员多数票的同意组成生产队新的革命委员会。如果当选队长提出的队委会人选，经过全队社员表决被否定，当选队长得再提出其他人选供全队社员选择。例如当选队长提议某甲担任本年度生产队记工员，表决结果被否定，当选队长便提出让某乙来担任此职，表决结果获得了大多数票的通过，这样，就算某乙被批准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了。全年的生产定额、指标、计划，在选举队长时，队长候选人就应明确作出。如该候选人当选后，其计划需作某些改动，必须经全队社员大会的通过。队长必须将收支情况、工分情况、分配况，随时向全队社员公布。全队社员大会可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或违法乱纪的队长。

由于生产队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只要诉诸于大多数人的裁决，人们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关切，使他们具有天然的强烈的民主要求和能够正确选择“当家人”的能力。这种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形成的切身的经济利益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定将能够帮助亿万农民打破传统的宗法、宗族观念和克服

文化水平的局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农村基层完全能够蓬勃开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如果说，生产队是农村劳动组织的细胞的话，那么，大队即是农村劳动组织的基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出现的“贫下中农管理商店”、“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合作医疗”等新生事物，就已充分表现了大队一级作为基础的重要性。但是，在改良主义的前提下，在特权的把握和控制下，这些新生事物，只有夭折或名存实亡的前途，而没有成长壮大真正使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可能。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大队立法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大队人民代表会议。大队人民代表会议负有监督大队行政班子整个管理工作和裁决大队和所属各小队发生纠纷以及推荐学生、审查和决定参军、参政、参工人员的全权。大队代表会议代表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小队，由各小队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但大队长、小队长及大、小队革委会成员在任期内不得当选为大队代表会议代表。大队代表会议的召集者为代表会议所选出的会议主席。大队代表会议每届任期二年。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大队行政权属于大队长。大队长每两年改选一次。如小队长那样，亦可连选连任，不限任次。大队长应由全大队十八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社员集会直接选举产生。大队革命委员会，由当选大队长提名，经大队代表会议多数票通过组成。大队革委会人员从简。大队长全年至少一半时间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不固定在本生产队。付大队长兼管文书工作，亦只得为半脱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管理全大队农、林、牧、副、渔、文教、卫生、供销社全盘工作。大队卫生员以及供销社工作人员和学校负责人，应由当选大队长从本地人或在本地居住三年以上的人中提名，经全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责成大队长对上述一

切工作负完全责任。

大队长如不称职，或有违法乱纪行为，大队人民代表会议有权随时将其撤换。

一如工厂那样，一切不正当选举都得视为非法，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会议或上级行政机关或代表会议或直接向法院提出控告，国家定当严肃处理此类弊端。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应用法律明确规定和确保农村基层经济核算单位的社会主义性质。农村各级领导同样必须模范地信守国家法纪。

3、军队

根据列宁的说法，军队历来是旧制度最顽固的堡垒。因此，对旧军队的瓦解就是对旧制度的摧毁。

瓦解旧军队必须从动摇旧军队的基础着手。而任何军队的基础都是士兵。

“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马恩选集》第四卷 336 页）特权专制下的军队，典型地反映了特权专制的腐败、专横和反动。

必须结束军队中将才横遭驱逐、奴才得到重用、官贵兵贱、上尊下卑、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腐败制度了。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威力将有力地打击军阀官僚特权制度，全面地、彻底地改造军队的素质。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民主原则和首长负责制必须坚决贯彻于军队之中。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质，其方式与工厂和农村略有不同。

军事和政治二者完全不应该分开管理，各成体系。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建军原则将使军事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高度统一，也完全能够高度统一。

班、排长由士兵直接选举产生。付班、排长由当选班、排长任命。

当选班、排长集合为连士兵委员会。连士兵委员会选举连长。连长提名并经连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连长、事务长。

当选排、连长集合为营士兵委员会。营士兵委员会选举营长。营长提名并经营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营长等必备干部。

当选连、营长集合为团士兵委员会。团士兵委员会选举团长。团长提名并经团士兵委员会多数同意产生付团长、参谋长等必备干部。参谋人员则由参谋长提名，团长任命。

上述选举按服役期两年一选。

团以上指挥员由国防部任命。

国防部直接由当选总统掌握。

班、排、连、营、团指挥员在战场上如遇阵亡或重伤失去指挥能力，则由上级首长直接另行任命，或按预定安排由原当选人员奋起顶替。所属人员必须绝对服从指挥，待休整时再经上述民主原则调整。由于指挥员指挥能力军政素养和战斗胜负及战士生死存亡关系甚大，所以民主原则和首长军政统一负责制在军队基层完全能够贯彻执行。军队得因此而大大提高战斗能力。同时，军队亦将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坚强捍卫者。军阀将因此而无一立足之地。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将逐步取消常备军，而向全民兵役制和全民武装过渡。

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公民的个人权利

正如同分配依附于生产同时也能促进生产那样，人权问题始终从属于同时也

能改进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说：“人民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权宣言》）这纯粹是骗人的谎话。只要看一看资产阶级所有制即“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马恩选集》第一卷 265 页）这一点就足够明白了。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在资产阶级的吸血制度下，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2 页）人们的父母与父母之间的财产关系贫富悬殊之大，还有如人们之间那样，从来就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私有制下，人们生来其实就不是而且始终也都不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向人们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清楚地阐明了，人们生来应当是而且能够是自由平等的。

为了实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第 1 卷 265 页）

那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不是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呢？我们的上述分析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公有制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国有化”和“集体化”，不过是私有制的改头换面，不过是使资本家的资本占有，变成了官僚的特权占有罢了！而特权占有比资本占有更使社会的不平等扩大了千百万倍，更使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不自由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特权占有下，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是被彻底地剥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极力要用牲口权取代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本来就应当享受到人权。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取代！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已经逐渐在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

然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决不会从天而降，决不可能从反动统治阶级那里获得恩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自己能够解放自己。“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0页）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并且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只有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能够使这一切获得牢固的保障！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使人民同是生产者，都是主人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律平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及相应的法律体制，使人民在法律规范面前一律平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两党制、人民代表会议制等，使人民真正不再感受到奴隶总管党的皮鞭的奴役威胁了，使人民真正享有了当家作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利！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将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仅有两党的中央机关报纸和刊物，而且有两党的省、地、县地方机关报纸和刊物，执政党能够表达官方的意见和解释，在野党也同样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政见

主张，得以在民间和人民一道行使监督的职权。新闻将恢复它神圣的真实性，将能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样化丰富内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欺骗宣传和不负责任的攻讦和诽谤，都将遭到人民的唾弃。新鲜活泼生动的文风，定将取代毫无生气的新老党八股。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努力贯彻和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提高和发展。文学艺术将享受到揭露一切黑暗和歌颂一切光明的充分的自由。国家将满足一切科学研究的需要，尊重并奖励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一切个人创造性劳动。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们将不断革除社会分工固定化的弊病。为此将努力满足人们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迁徙和强制性的分工应该逐步废除。国家将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缩小三大差别，提高较差地区和较差工种的各方面待遇，全面地推动生产的发展。人们由代表会议签注的工作证，将成为人们自己掌握和使用的职业履历证明书和选择职业的介绍信，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对待历史积累的一切迄今合理的因素，决不抱形而上学的排斥的态度。相反，对于以往历史所提出的一切在今天仍有进步意义和可取之处的东西，它都将经过必要的扬弃，历史地予以肯定。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对待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的一些主张，就持这样的态度。这些主张是：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

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等等。

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无产阶级绝不会对此

掉以轻心。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马恩选集》第1卷14页）并说，无产阶级“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同上，第15页）如果说，这在资本占有制下已经是如此的话，那么，在特权占有制下就更是如此了。如上所说，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

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

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

七、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定能得到满足

上述实施方案，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针对着社会主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根子，并为了铲除这个根子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要一劳永逸、无所不包地解决整个社会过去未来的所有问题，它只不过是抓住了主要之点，为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自己政权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奠定了一个合理的基础。这决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决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它是只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经认识到并决心去做就能够达到的现实境界。正如同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变革所一再昭示过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社会需要，都是整个社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孕育的结果，这种需要为人们所认识，正是这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的前兆，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乃是基于先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展进程所造成的

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这种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的得以明确，正显示了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客观条件和时机已经具备，已经成熟。千千万万受尽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颠沛无告、在黑暗中痛苦不堪的人们，将奋起向光明进军！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定能得到满足！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

一、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 110 页）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到政权的国家里，在列宁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论断面前，修正主义一反从前否定、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孔，一变而为响亮地叫喊“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标榜他们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口口声声宣称他们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

但是，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呢？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任意压迫和宰割人民的暴虐统治，把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专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把权力为少数奴隶总管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把大大小小的世袭君主独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实行的赤裸裸、血淋淋、野蛮透顶、残酷到家的恐怖政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诬蔑、迫害、抓捕、监禁、镇压、屠杀，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把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

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把禁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思想和人身自由的社会监狱，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任意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任意侵犯、搜查公民的住宅，抄公民的家，任意侮辱、捆绑、毒打、扣押、逮捕公民的法西斯暴行以及利用职权不拘形式对公民的打击报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一句话，修正主义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民主、自由、人权的蛮横剥夺，把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天堂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地狱，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这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地地道道的专无产阶级的政！

修正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地地道道点冒牌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到了澄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了。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样的专政吧。

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1、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源、目的和时间

马克思在 1852 年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恩选集》第四卷 332—333 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但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来源于任何人的臆想，或任何学派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来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序言中，对此进一步说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使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恩选集》第 1 卷 232 页）

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整个社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而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选集》第 3 卷 21 页）

2、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

I、马克思所下的定义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

《马恩选集》第一卷 479—480 页)

马克思本人在 1850 年写下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始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一个最概括、最本质、最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都不过是这一定义的补充和发挥。我们在研究这个定义时,应当注意到马克思自己在这一定义中所着重强调的三处地方。

II、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

——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宣布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

在这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态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态度就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宣布不断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明的“宣布不断革命”究竟是针对着谁说的呢?

就在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的这句话的紧前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种宣布不断革命不是针对着资产阶级而是针对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言的。对于已经反动的资产阶级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断不断”革命的问题,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小资产阶级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断不断”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称为“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今天在无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不但仍然存在,而且

更为嚣张，确实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危害和威胁。请注意，马克思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上，第 479 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的革命专政。它是指发展变化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这与马克思在作出此定义之前，于 1845—1846 年和恩格斯就表达过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费尔巴哈》见《马克思选集》第 1 卷 40 页）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作出此定义的几乎同时，于 1850 年 3 月在另一篇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宣布的“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同上，第 385 页）的思想，也完全是一致的。

这与马克思在作出此定义之后多年于 1873 年在《〈资本论〉第一版跋》中十分精颤地表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

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1卷24页）更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僵化政治，和“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把现代社会理想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卷385页）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在本质上、在根本立场上，就是格格不入的，就是正相反对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在根本立场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III、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和灵魂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就不但表明了全部政权归无产阶级，而且还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君主专政、党阀专政、军阀专政、宗派专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

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早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此定义之前，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恩全集》第2卷第104页）并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

的事情。”（《马恩全集》第16卷15页）而在作出此定义之后若干年，在1879年他们两人又重申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恩选集》第3卷374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应该是无产阶级全体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权利，决不应为高居于无产阶级头上的少数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夺并假名强制性固定化垄断、霸占！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阶级的专政，而无产阶级又是由如此众多的人组成的，那么，这种阶级专政怎样才能做到呢？很清楚，实行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实行阶级民主。专政和民主，对同一阶级讲来，本质上完全是一个东西。或者说，专政和民主，是一个阶级政权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专政施于外，民主用于内。任何阶级的专政，除了由于历史进程决定的本阶级的阶级地位等客观条件外，都必须建立在高度动员本阶级的阶级力量这一基础之上。任何有效的强有力的阶级专政，都需要动员和利用统治阶级每一分子的力量。责任心、创造力、积极性、斗争精神等等。统治阶级的阶级动员越充分，专政的力量就越大。而统治阶级动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统治阶级自身内部充分发扬了民主。倘若统治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获得了充分的主权，那就没有任何可以任意支配整个统治阶级意志的个人特权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除非他的意见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愿，代表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动员和发挥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加强本阶级的专政服务。列宁左勿右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时说道：“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共产党宣

言’就是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

（《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三卷 238 页）并且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确保“穷人、十分之九的居民享受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几乎是完全的，只是由于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而受到限制。”（《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单行本第 30 页）毛主席在总结建国十三年来，尤其是大跃进的经验时，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转引自 1968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生命，而无产阶级又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和现存生产水平之上，既无可避免地与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必然受着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剥削阶级的影响。那么，这种阶级民主又怎样才能坚持其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保持其共产主义方向及其纯洁性呢？显然，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必须以体现着无产阶级意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制为其前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法制的统率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才能够始终坚持其社会主义道路，才不至于丧失其共产主义方向和纯洁性，才能强烈地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及其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有力地防止和排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倾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制，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正确方向和准则，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气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以及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马克思主义法制的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老虎屁股党的寡头特权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同样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而这鱼和水的关系，又正好似刘备所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隆中对》）

IV、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指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何在。

在这里，马克思不但就已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性，而且就已指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着“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并且，在这里就已明确地、具体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不断革命的方向，这就是要消灭三个一切和改变一个一切。而这些目的、任务和方向，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专政若不为消灭这三个一切和改变这一个一切服务，若不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若不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者是在消灭前一种阶级剥削——例如打倒资本的同时，却又造成了另一种更罪恶的阶级剥削——例如培植特权，那就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对于消灭诸如差别、关系以及改变诸如观念这类东西，虽然并不绝对

否定暴力有可能发生某种效用（例如在消灭或者改造私有制过程中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是，决定性的是暴力没有能力都做到这一点和完成这一点。事情很清楚，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绝对不同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敌人或一只鸡那样简单，而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就更是绝对不同于弯曲一根铁棍那样凭借暴力。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过暴力一下子能够实现的，甚至简直就是暴力所根本做不到的。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请问你能用暴力清除旧社会死尸毒害我们的臭气吗？请问你能用暴力铲除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土壤吗？哪怕你就是握有重兵、最有铁的手腕的全地球的红军总司令，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29卷381页）并说：“归根到底，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所代替，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最大泉源，才能是巩固和扩大这种胜利的惟一保证。”（同上，385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任务和方向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不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448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正在于实现“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采取“新的更高的社

会生产方式”！

这与马克思主义暴力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暴力”（《马恩选集》第3卷211页）的原理是符合的。

由此可见，那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笼统地完全当成或者主要当成是暴力的说法或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都只不过是劣等资产阶级专政和纳粹法西斯专政的翻版，都只不过是杜林一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关于“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寻找”（转引自《马恩选集》第3卷198页）的胡说的翻版。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迷信屠刀、棍棒和镣铐的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的暴力恐怖统治，是根本不能并足而立，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反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才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不断实现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不断采取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

V、暴力的作用

——助产婆和辅助工具

根据马克思所下的定义，上述三点：

- a. 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
- b. 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和灵魂；

c. 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这三点，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构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应当看到，上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只有在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政权，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能够全面施行。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摘自 1967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还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摘自 1967 年 1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可是，“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列宁全集》第 9 卷 437 页）过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反动派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高潮未到来，无产阶级的兵临资产阶级的城下之势未形成的时候，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是绝对不会向无产阶级拱手交出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来的。显然，“争得政权”和“运用政权”是两回事。没有“争得政权”就不可能“运用政权”，更谈不上专政。那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够争得自己进行专政的权利呢？《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恩选集》第一卷 262 页）应当“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同上，263 页）在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以后，马克思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及时地丰富和发展了他所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容，及时地指出了：“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马恩

全集》第 18 卷 165 页）正是在这个使命面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 17 卷 468 页）并且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他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马恩全集》第 18 卷 694 页）

由此可见，“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恩选集》第 3 卷 223 页）在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以便建立本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候，甚至包括在取得政权的初期阶段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将不可避免地突出在首要的地位上。而在此之后，并不是取消而只不过是首要地位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由钢弹和刺刀的形式转变为政府措施和法律形式，由助产婆转变为工具罢了。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到国家政权后才能建立起来，暴力将作为专政的一个方面与专政共存下去。由此可见，随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并且由于这两个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也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

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端，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趋于成熟的标志。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再予以分析。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但从理论上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而且从实践上确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

恩格斯在 1891 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15 页）

那么，巴黎公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始人所确认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样版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最好就让我们引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对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主要著作《法兰西内战》的摘录来说明这个问题吧。马克思是这样总结、这样论述，而列宁是这样摘录的：

“（1）‘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2）‘……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3）‘……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并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4）‘……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

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5) ‘……其他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6)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7)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8)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解散和剥夺教会）

“(9)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 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10)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该由各公社选举出来（《法兰西内战》原文在此处还说：“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r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论公社》第54页——作者注）

“(11)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废除（断言应该废除是有意的捏造），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12)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消灭，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

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13）‘……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或镇压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

“（14）‘新的历史创举通常会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新的机构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15）‘……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16）‘……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经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17）‘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18）‘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

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是生产者阶级与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19）‘……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它（公社）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同上，370—374 页）等等。

由此可见，上文把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定义指出来以及对此定义所作的解释和推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巴黎公社革命事业的直接继续，不过是要将巴黎公社未竟的事业加以完成。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

1、巴黎公社的教训

但是，巴黎公社为什么仅仅存在了 72 天就失败了呢？马克思说，公社“本来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马恩选集》第四卷 393 页）列宁说：这“两个错误都在于采取进攻行动不够，对打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认识和决心不够。”（《论公社》362 页）恩格斯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

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同上，266 页）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公社曾经犯过“没有占领法国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没有明确的纲领等等”错误。（同上，第 327 页）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经历一个预备阶段或称为初期阶段。

2、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阶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原来这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及初期为巩固政权而斗争的这个阶段；就是从资本主义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这个阶段；就是变更经济基础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这个阶段。在中国，这个阶段的时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这两个时期。

因此，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那样，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也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预备阶段或称初期阶段。

在这个初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倒资本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全面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本义奠定基础，准备必要的条件。在这个初期阶段，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旧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

因此，这个初期阶段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路部分。万事开头难。这个初期阶段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争夺国家政权而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阶段，是

无产阶级和以资产阶级为首的有产阶级就要不要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而进行激烈斗争的阶段。

因此,这个初期阶段是充满火药味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尤其表明了“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这样的字眼是不能信口胡说的。”

(《列宁全集》第30卷322页)而与这一个初期阶段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

3、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的特点

I、暴力居于首位

第一个特点,暴力这位助产婆居于首位。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在夺取政权时期,“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列宁全集》第28卷341页)“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列宁全集》第12卷261页)“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列宁全集》第4卷242页)因此,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高潮尚未到来之际,当国际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形势尚未形成之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非暴力不能打碎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非暴力断难夺取到国家政权!

显然,在这样一个用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也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的——因为在此以前的法律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律。

其次，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但还尚未使政权巩固下来的时期，即如列宁所说：“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列宁选集》第3卷516页）

正因为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虽然夺得了政权但还未巩固政权，正因为这个时期“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灭，也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的反抗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92页）正因为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不但面对的是“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一贯反抗”（《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页）而且所面对的是整个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的反抗与挑

战，并且还面临国际资本的包围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时期暴力的运用虽然没有上一个时期即武装夺权时期显著，但仍然居于突出地位。没有无产阶级暴力的强大威猛，无产阶级刚刚到手的政权就有可能得而复失，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方案，尤其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实施。

但是，应当看到，尽管在夺取政权和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暴力虽然居于首要地位，可是根本的东西还是经济运动，还是在于采取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没有土地革命的号召和行动，就不可能有工农红军，没有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等等。

II、一党制垄断权力

第二个特点。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到为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斗争，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垄断权力的，只能是一个共产党的党组织。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夺取政权都不同。从前，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无非是用新的剥削关系、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关系和旧的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则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在旧社会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反动阶级的奴役和毒害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而走上自觉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毕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全体，而只能是之中一部分先进分子；

因为在旧社会反动阶级专政的血腥统治下，只有这一部分先进分子才有可能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而组成一个为当权的反动派所不容而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

英勇奋斗的党。当时艰苦危险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使党能够自然地排斥了投机者和自然地淘汰着投机者。生于忧患。在这种条件下的共产党是新生的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充满着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因为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和革命力量对比的关系，由于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尚未争取到斗争的主动权，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中也只能集中于一个党内才能对付掌握着主动权的反动阶级，而在夺取到政权以后，又只有经过长期夺权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这个共产党才能够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改造。

正因为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到为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旧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标和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正因为还未受到特权的入骨腐蚀，正因为初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胜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200—201 页）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预备阶段或称初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处于无产阶级事业核心地位垄断权力发挥领导作用的，只能是并且也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

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选》四卷第 1360 页）

同时，也应当看到，初期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行无产阶级一党制的时候，建立了在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在夺权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正是通过高举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旗帜，才在民众中博得了“实行民主好处多”的声誉，才能够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孤立反动派，才能夺取到政权。“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马恩选集》第 1 卷 12 页）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同样也是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的。

III、集权专政

第三个特点。服从于居于首要地位的暴力革命和居于核心地位的一党制的需要，初期无产阶级专政以集权治世，立法、行政、司法事实上融为一体，集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掌握下行使政权职能。

至于之所以需要如此，原因自明，无庸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这种以暴力居于首要地位为背景的一党制集权专政的时候，有一个反动派的政权和政党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着，或者至少是作为对立面的这个反动政权和反动派实际影响还存在着。因为这对一党制集权专政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竞争推动力。而这种竞争推动力又使党在争取民心的同时容易比较敏锐地和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有利于避免自身内部的僵化，因此在这个时候人民群众的监督力是有效的。反之，随着对立面及其影响的减弱或消失，这种竞争推动力和有效监督力也就会随之减弱和消失。

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实行一党制集权专政；打倒资本统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的主要特点。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1、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

当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上层建筑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阶段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也就到来了。这一阶段和上一阶段相比，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个阶段，旧的经济基础已经变更，无产阶级已经运用政权的力量，加速完成和初步巩固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进步，都使以私人占有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简单重复了，而被推翻的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生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自然规律大批走进坟墓，并将完全地走进坟墓去了，剥削者已经变了样。产生剥削的根子也变了样。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由在外部变成了在内部并且是在内部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对象已经由旧的剥削阶级变成了新型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走资派。

因此，这个阶段已经到了必须把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主要在于不断采取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全面地贯彻和落实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务，是夺取反修防修胜利，砸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打倒特权利

奴役，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变革上层建筑，建立和健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全面地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高速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低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的过程中，必然同样要经历一个过渡程序。这个过渡程序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国家政权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有可能直接较为和平地和顺利的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反之，如果国家政权已经落到修正主义者手里，那么，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过渡，其间必然同样要爆发一场比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更为复杂、更为血腥和残酷的武装夺权斗争，开展更高一级的暴力革命。

2、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的特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我们在第十章里，已经作了一个大概的勾划，其原因在以前的各章里也已经加以阐述。这里仅就其和初级形式相比的特点简单说一下。

I、法制

鉴于发展了的情况，鉴于必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鉴于必须防止社会主义公有制演变成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鉴于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革命，鉴于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采取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鉴于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虽然逐渐死亡，但旧的剥削阶级的影响和残余还存在，鉴于资产阶级法权和小生产的存在，鉴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存在，鉴于新型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出现，鉴于决不能听凭官僚一己的喜怒

好恶颠倒是非为所欲为，鉴于对特权滥用暴力的情况应当消除，所以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整套成文法及其权威。马克思主义法制的根本点在于使革命合法化，保护不断革命，保护社会主义经济，保护反对把任何现代社会理想化而不断谋求采取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行动。

II、民主

鉴于必须消除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化党所构成的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特权腐蚀作用，鉴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非变革不可，鉴于马克思主义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而得到的普及和有了更广泛深入普及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用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代替了一党制，从而使政党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而不是专政无产阶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老虎屁股党。居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而权力则来源于无产阶级民主共和普选制，等等。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原则在于落实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使整个无产阶级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老爷真正地直接地当家作主，解放劳动者，解放生产力。

III、分权专政

鉴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革命的主要敌人不但产生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而且产生于集权专政的权力结构及其所导致的特权对当权者的特效腐蚀性，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与其初级形式在权力结构上正相反，它不再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情况下以权治世，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归于一身集权专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的统一下，以权治权，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无产阶级分权

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剥削，防止权力特权化，防止国家权力机构按照惯性走向人民的反面官僚化，用以保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和自由。

IV、人权保障

鉴于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鉴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基本人权的保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分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巩固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使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下的公民，能够真正地、广泛地、愈来愈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人权保障的根本方向在于确保劳动力彻底摆脱矛盾混合物地位，消除商品性质和奴隶性质，牢固地确立主体地位。

总之一句话，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全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这些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的主要特点。

3、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狂吠

I、为何狂吠

正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十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的全面贯彻落实，正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是夺取反修防修胜利的根本措施，正因为这种形式不但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且专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政，正因为采取这种形式是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这种形式使官僚主义者阶级丧失了吃人不吐骨头的特权资本，所以它必然会遭到一切剥削阶级、尤其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猖狂反对。官僚主义者形“左”实右的故伎必然重演，他们

会神经错乱地狂吠什么这是“反党”、“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等等。

II、驳所谓“反党”

什么“反党”！难道你们这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官僚主义者豺狼就是党吗？你们这样的党我们就是要反对，我们就是反定了！当此之时，不反对你们这样的党就不成其为革命。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或机会主义的党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政党是合理的那样，反对你们这样反动透顶超等的毒蛇猛兽吃人民害人民阻挠历史前进的叛徒党，是绝对的造反有理！我们反对你们这样的党，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学说和事业的维护！那些真正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都肯定会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而你们动辄以“共产党”的招牌镇压人民对你们的抵制和反抗，却正暴露了你们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III、驳所谓“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什么“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难道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正是十分有利于“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吗？难道不正是使阶级斗争能够最合理、最人道的经历它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的最好方式吗？难道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本义的最好体现吗？要说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抹煞阶级关系的变化，否定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贫下中农的尖锐对立是现实的主要的阶级矛盾，用昨天的历史的僵化了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今天的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不同

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把革命当成“反动”，把人民当作“敌人”，把背叛尊为“忠于”，用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冒充和反对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斗争，用社会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用修正主义制度代替了社会主义制度。

所有这一切证明，真正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正是你们！

IV、驳所谓“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什么“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对你们这一胡说最好的回答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论公社》第 55 页）告诉你们，正因为无产阶级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民主、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形式有点相似”，所以才成其为进步，才成其为新的历史创举！因为这样正符合事物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形上升的辩证规律，正符合恩格斯所说“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马恩选集》第三卷 180 页）正符合列宁称为“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为旧东西的回复”的“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单行本 159 页）不错，是同样称为“法制、民主、分权、人权”，但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另一个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内容已经根本不同了！正如同无产阶级

专政的初级形式必然有些“好像”封建专制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也必然有些“好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必然如此！难道你能够根据“国家”一词的相同，就把所有国家都归为奴隶主阶级国家一类吗？难道你能够把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和原始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吗？

V、历史车轮不可阻挡

不读书、不研究，形而上学充斥头脑，阴谋诡计祸心包藏于胸的官僚老爷们，你们究竟有没有看懂上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问题的论述？你们究竟有没有一点正视现实的勇气？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你究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立场，修正主义的立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立场上？

不要再坚持你们那一套“剥削有功、压迫有理”了，不要再利令智昏下去了，不要再梦想你们的修正主义天堂了。你们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的总崩溃之势已经近在你们的眼前了！

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已经怒吼了，人民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是到了掀翻你们这桌“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筵席的时候了！

任何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定将被历史车轮无情第碾碎！

六、危险的关头和极好的时机

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遭到了资产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老修正主义分子的疯狂的攻击、谩骂和反对，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挡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步伐。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掌权执政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却轻而易举地做了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分子极力想做而始终做不到的事

情。

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国家机器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他们用典型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即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冒充无产阶级专政，玷污无产阶级专政，糟蹋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得面目全非，丑化得声名狼藉。

他们这种做法对内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事实已经证明，绝大多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都已演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不要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旋得旋失，并且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惨遭欺骗和屠刀的扼杀了；不要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毁灭了，而且无产阶级本身已更为悲惨地沉沦在极端残酷和野蛮的恐怖专政之下了！

他们这种做法对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一方面使目前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劳动人民在比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往往会发生错觉，把修正主义制度当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法西斯专政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遭到了极大的阻碍。另一方面，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社会生产的巨大生产能力和巨大竞争能力，对遭受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掠夺、压迫和剥削的国家，必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修正主义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专政，又正好适合这些国家充满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们的胃口，他们十分乐意效法打着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利用本国已经具备的革命条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大搞国家资本主义，在既成生产方式的推演下，为谋取自己

身家世袭特权地位，而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的黑暗深渊。在实力竞争空前激烈，生产垄断非常必要的当今世界，将有为数不少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与其说是在朝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不如说是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向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专政即社会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制度发展。这样的发展，其实质就是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入了超等奴役压榨制度的死胡同，决非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确实已使社会主义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确实已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在这个意义上，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活动的历史罪恶，就在于有可能将整个人类社会推进极端黑暗的修正主义制度，社会法西斯专政的时代，而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但是，正在这样严重的危险关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同时，整个世界历史也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即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第五节第三段所述，全世界所有现存社会制度都因其自身内在弊病的恶化而在钻牛角尖。

资本主义制度陷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这一基本矛盾中，深受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在剩余价值理论和人民革命的打击下，风雨飘摇。叉路口社会主义制度陷在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一基本矛盾中，眼看着官僚主义者阶级一步步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面临变修的危险。修正主义制度陷在社会主义招牌下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这一基本矛盾中，深受严重的周期性政治危机，内部僵化和人权运动的冲击和威胁，外强中干，随时都面临突然事件的爆发，摇摇

欲坠。

并且，在这些社会制度下，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全面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正越来越尖锐，无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叉路口社会主义世界更是达到了空前尖锐激烈的地步；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修正主义世界里正日益白热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并且，奉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与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整个世界在矛盾斗争冲突的旋涡之中打转，不得解脱。特别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酝酿着新的世界大战，而这新的世界大战又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上的新型战争。从而导致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人类正承担着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压力。等等。

这一切，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全世界胜利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时机。但是，停留在从前形式和水平上，是不能利用这样的条件和时机的。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条件和时机。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阐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有掌握了敌人的一切，才有可能消灭一切敌人要彻底剥夺剥削者，必须连同剥夺者的剥夺手段也一起剥夺。

不为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真理留有余地，相反观点就理所当然地享有存在的权利。在互相连接、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客观事物面前，任何人既不能抗拒表现着必然性的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排除还具有必然性的存在的必要。

因此，当无产阶级不但对资产阶级专政作了革命的批判，而且对自己的专政

也作了批判的革命以后，当无产阶级宣布要进行真正的民主革命和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宣布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把资产阶级头上的最后一道灵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含的合理性——予以剥夺和利用（就如同剥夺和利用他们的生产资料那样）的时候，国际资本家制度的全线崩溃和修正主义制度的迅速瓦解，是任何人都挽救不了的了！

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许多寻求解放的国家风起云涌，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狂飙巨澜一定会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里，“横扫千军如卷席”！帝国主义国家为这场革命准备了人们变革私有制的要求和民主传统与垄断资本——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梯；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则为这场革命，准备了可以立即还原为公有制的基础，准备了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准备了人民大众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自己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渴望。

唯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在当今世界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使新的世界革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使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建立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篇章，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抓住这样的时机，刻不容缓地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将对全世界，全人类发生深远的强烈的影响——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决不能错过这样的时机，决不能放弃或者拖延这样的革命！

第十二章 政策与权衡

一、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

人民和革命的概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即在现阶段，对待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区分人民和敌人、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奋斗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都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同志。一切反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敌视、破坏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势力、集团和个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都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的反动派。

二、对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待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是实行免职留薪、保留原有待遇，同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公民权利的政策。举例而言，在这种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策下现任中央各部部长的前途，将有如下几种选择：

(1) 可以争取当选总统。如当选，工资等待遇，即按总统待遇供给。

(2) 有优先条件可以争取当选总统提名继续担任现任部长职务。

(3) 如已届退休年龄，决意退休，将仍享有现任部长退休待遇。

(4) 可以在自己多年工作过的省区或家乡省分，争取当选为本省区地方行政首长或省区的及全国的人民代表或常务委员。当选后，工资待遇如低于现任部长待遇，则一概保留现任部长的待遇，如高于现任部长待遇，则应按当选职务的待遇供给。

(5) 如无意政治而又未到退休年龄愿做普通公民，则可以按自己的兴趣自愿挑选工作和工作地点，对其家庭和子女的安排，国家将根据本人意见给予照顾。其工资、生活、政治待遇将完全按照现任部长待遇供给，直至去世。

如此等等，其余一概可以依此类推。

如果这一批现任领导干部同意上述政策，支持和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那肯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人民将像当年拥护他们那样拥护他们，他们将作为革命的宝贵财产，继续为革命立下新功，理应继续受到人民的尊重和国家的保护。即使他们从前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哪怕是很严重的错误，国家和人民将一概既往不咎。因为他们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行动本身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愿意革命，继续革命，忠于革命，他们从前所曾犯过的错误，与其说是个人的错误，不如说是历史的错误。是起支配作用的生产方式内在的病根恶化了的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1卷第12页）因此，国家和人民对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策，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任各级领导干部，决不会抱有成见来追究个人的责任。对这些人的既往过错将抱历史的宽大的态度，而对这些人的贡献和成绩，将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确认。

三、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

在今日中国谈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不考虑到仍然还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存

在着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从它的阶级性质来看，国民党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对抗性矛盾的关系。国民党在掌握政权、武装精良的情况下，失去人民拥护，被共产党击败，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是不是国民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整治，而共产党也经过了如此巨大的演变之后，国民党又能反败为胜卷土重来呢？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已非从前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中国除台湾省外，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已经广为传播，人口已经将近十亿。人民吃过国民党腐败政治、污吏横行的苦头，对此至今记忆犹新。重建信任比争取信任更难。国民党鼓吹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民主，这种民主自由只能是地主资本家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况且，民主自由旗号下的国民党政治，其实就在资产阶级内部也依然是一家之言，比起美日等国资产阶级多元政党民主政治来说，依然不过是一党独尊、一党独裁的政治。在今日中国形势和世界历史潮流面前，国民党要想重新获得对中国的统治，显然已是极不现实的了。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中国国民党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党。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当时是进步的学说，在现在仍有许多合理的成份。毛主席说过，孙中山先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还看到，中国国民党尽管其上层一部分属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其主

要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我们还看到，近些年来，国民党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动。无论怎样说，国民党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值得欣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了改造中国和改造社会，确实全心全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尊重客观实际，能够不断革命的人。不要说在他的后期，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那些著名的言论和政策了，还在同盟会时代，他就明确地斥责过那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以言治也。”（《孙中山选集》上卷 94 页）就认定“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同上 95 页）认为欧美民主政体贫富阶级相隔太远，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同上 85 页）因而他在辛亥革命刚刚过后就宣布：“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前二者，吾同志已洒几许热血而换今日之成功，则今后更宜极其心思，尽其能力，以达最后之目的。此则予之所深望于同志诸君者也。”（同上 93 页）后来又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同上，下卷 797 页）……

总之，鉴于这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期望和欢迎中国

国民党能够沿着孙中山先生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参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对中国国民党采取如下政策：

（1）根据本章第一节所定界线，凡赞成、拥护和参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努力，促进和平统一祖国的国民党人，都是人民的一员，都是革命者，任何人不得有任何歧视。

（2）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国民党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待遇，都与对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任共产党领导干部相同。

（3）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台湾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区实行地方自治。

（4）如果台湾人民根据自治原则决定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有财产应收归国有的部分，国家将予以赎买。

（5）国民党人和台湾居民愿侨居国外者，取其自由，绝不阻碍干涉。

（6）国民党如拒绝上述政策，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敌视和破坏态度，那当然比将受到人民革命的武器的批判，归于消灭！

相信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定将在台湾社会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定会加速祖国统一事业的完成。究竟是选择和平统一的道路，还是承担武力解放、暴力革命统一的道路，望国民党好自图之。孙中山先生曾作过著名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说：“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同上 85 页）望所有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精神的国民党人，顺应历史潮流，走上光明的坦途，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为国建立功勋，为人类建立功勋！

四、从拿破仑的失败和华盛顿的成功说起

名震全球的资产阶级英雄拿破仑，最后是死在流放他的海岛上了。他临死时的心情，我们大可不必去加以揣测，但是对他的失败，却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应从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来加以观察。如果说拿破仑的失败是以对俄战争为定局，那么，这失败主要不在于他进攻欧洲封建主义的最大堡垒，不在于他竟然把毛瑟枪口对准了了不得的沙皇，不在于俄国统帅是库图佐夫，不在于莫斯科大火和奇寒冰冻。不，不在于这些。他打进莫斯科直捣沙皇老巢是勇敢的行动。他的失败在于他打进莫斯科后不利用沙皇俄国当时已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没有及时地宣布解放农奴，没有造成从内部致命处瓦解沙皇俄国！如果他当时立即宣布解放农奴，那么，广布沙皇军中和社会上的农奴渴望解放的心情，就会变成欢迎解放的行动，沙皇俄国的社会 and 军队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和崩溃。如果说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话，那么，作为封建势力的头子沙皇亚历山大却相反具有了“法国共和主义”的气度，能够巧妙地让法国在欧洲封建势力联军的进攻面前作选择：不是在拿破仑或者波旁王室这二者当中选一个，而是在拿破仑或者共和国这二者当中选一个！还有，拿破仑的侵略统治虽曾在西班牙人民战争的反抗面前，一再感到头疼和动摇，可是，当联军打进法国也最害怕法国人民战争的时候，拿破仑却害怕发动全民族！如果说这也是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话，那么，更为矛盾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拿破仑竟然搞封建专制加冕称帝！当然，一个人的革命专制，总比整个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集体专制对人民要好得多。但是一个人的革命专制总是敌不过整个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叛变的。拿破仑厚赏有功将领，却培植出了新贵族！他

所封的元帅、公爵、伯爵、男爵们，到头来乐不思战，还是背叛了他及他们自己先前的誓言！拿破仑确实是一个矛盾的人物。矛盾的拿破仑的真正失败，在于他作为法国胜利象征而建立起来的旺多姆凯旋柱，最后被法国人民自己当作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而加以毁掉了！

而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才智方面看来似乎远不如拿破仑，但他却取得了拿破仑所没有取得的成功。他领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而当战争胜利终了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加冕称帝，而是宣称：“农事是我生平最喜爱的娱乐。”只想解甲归田。他在制宪会议以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但他也没用已有的威望和到手的权力来改元称帝，而是遵守宪法，在任满时发表了感服人心的“要团结——要做美国人”的告别演说，回到他老家维多尼亚的乡间。然而，华盛顿是成功了！他的成功不在于他能颐养天年，既未被流放、监禁，也未遭受过暗杀的威胁和颠覆、政变、身家不保的恐惧。重要的是，他所与之建立的制度对他的国家和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恩选集》一卷 611 页）无怪乎弗兰克林会说：“我时常又时常，在开会的时间里，在我对它的结果抱着希望和恐惧的变迁里，看着主席背后的太阳不能说出它是上升的或是下落的，但现在，到最后，我很高兴，我知道它是个上升的，不是个下落的，太阳。”

这些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往事和人物，华盛顿、拿破仑、沙皇，离现在已经久远了。而现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是

也出现了列宁、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吗？人们对他们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历史是无情的，但历史又是正直无私的！每个有幸能作为历史人物的人，应当很好地珍重自己的历史地位呵！

应当慎重的加以选择。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往往只因一念之差。究竟是让世人怀着敬仰之心来提起自己的名字，还是让世人充满憎恨之情来诅咒自己？究竟是忠于马列，维护党的事业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因而也能解放自己，还是背叛马列，保护官僚们的利益，更罪恶地奴役人民，因而最后必然被人民所打倒，祸及身家？这似乎是关系私人的得失之事，但其实完全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大事，是至大之公事，不可不慎之又慎。

在比较利害得失进行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的两点是：

A、不敢于自我否定的代价是使自我肯定成为不可能；

B、谁企图把屠刀伸向革命和正义，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绞刑就等待着谁！

革命和正义是永生的，刽子手的生命是短暂的，任何欺骗都是不能持久的！崇高和卑鄙、光荣和无耻，有着天壤之别！显然，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那种对权力来说是暂时的上帝，对人民来说是永久的公敌，对其身家性命来说是丧失自由的囚徒，对历史来说是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可取的。

显然，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下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命运也是不足取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在对权力长期的固定化垄断这种存在下，任何开初最民主最明智的人，思想意识也会日益僵化，随着对基层生活的日益脱离，随着年岁的增高，随着垄断权力时间的日益延长，思想作风必然

轻则保守，重则专横。伟大的斯大林的晚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旦最高领导成了这种状况，势必给国家、人民、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本人不利，对党的根本事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尤为不利。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者一旦有了帝王思想，一定要弄到身败名裂亡国的地步。同样道理的另一方面是，只要叉路口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形成帝王专制的土壤，党和国家领袖就有至少要在晚年犯错误乃至犯严重错误的危险。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究其主要根源难道在于他本身的主观因素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显然，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远大明达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又充满了为整个人类、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忠诚奋斗的革命热忱和斗争精神的话，他是一定会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决意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决意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因而他理所当然地会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奠基者，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的第一任大总统。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因他的领导和参加，而得以相对和平地展开；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发动新的世界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从而大大地减少革命、国家和人类的牺牲，大大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因而他必定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真诚的拥护，他无私无畏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他善始善终的业绩定与天地共存！这样的命运才是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值得争取的命运。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着人们，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适逢社会的需要定将广为传播开来。当整个社会已经明

确了当今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尺度，人们便有了选择自己所走道路的方向。谁忠诚于人民，人民就忠诚于谁，就爱护谁；谁想专制人民，人民仇恨的怒火就要焚毁谁，人民就要打倒谁！人民如水，统治者如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中国七世纪初期封建帝王唐太宗就已懂得的道理。“在一个国家里，首脑人物多半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明确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将像一股清新的风，有如春风，胜似春风，吹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囊括全球！人民能够懂得，人民能够实行他们的伟大导师的教导：“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恩选集》四卷 211—212 页）

五、重上井冈山，揽月捉鳖世上无难事

1、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必要性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 347 页）“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

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同上，348—349 页）

因此，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篡夺或教条主义窃取，拒绝并使用暴力镇压和扼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果断地着手准备和积极进行第二次武装夺权斗争，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摧毁反革命的暴力，必须发动武装起义或军事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推进全国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迅猛开展。不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势必半途而废，世界就势必陷入修正主义制度的黑暗深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势必要被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变为牲口，变为会说话的肉制工具人，新的现代化世界大战，将不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化起来，就在本世纪内爆发。与其让修正主义血腥的反革命阴谋勾当安然得逞，不如让社会主义事业从绝路上杀出生路来；与其让现代化核战争在地球上掀起血雨腥风，不如让国内常规武器革命战争推动世界革命，争取世界和平，把人类从修正主义奴役和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

在这里，决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当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立即由初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立即从第一阶段全面地上升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当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已经一天甚似一天地严重摆在党和国家的面前，而唯一能排除这种威胁的有效措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教条主义者却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把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一些原理，僵化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强迫整个社会和人民继续奉行，强迫成人继续儿童时代的爬行。他们的信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正因为资产阶级会

吃饭，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也吃饭。”教条主义为修正主义上台铺路架桥，异曲同工，本质上和修正主义一样，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每一次社会全面变革的前夕，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选集》第一卷 347 页）

2、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方式

在本章题目之下，这里只谈以下两种方式：

I、宫廷政变式

“对于一个恶人无礼貌正是有礼貌。”

宫廷政变式是在中央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甚至近卫御林军中级干部，只要决心去做，就有机会，就有条件，就能够做到的。无数专制独裁国家发生政变的经验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专制统治者的共同特征，就是脱离人民，害怕人民，深居于宫廷之中，行动诡秘若隐若现，他依靠御林军的保护，也就落在了御林军的掌握之中。反动的篡夺和无耻的叛徒行径必将激起人民的满腔的仇恨和愤怒。这种仇恨和愤怒必然会反映进宫廷之中，感染进宫廷之中。在人心思变如渴，好似久旱沉闷之际天边一丝闪电都会给人们带来希望，在遍地都布满了干柴和汽油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火星足以燃起满天的大火。当此之时，匹夫起于草莽，尚可从者如云，何况风云突变，令从中央出？在集权专政、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政治结构和生产方式之下，顺应历史潮流，自上而下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心所向，海内响应，势如破竹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有的地方军阀顽固守旧反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绝对阻挡不住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奔腾澎湃！正如同列

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洞悉士兵要求和军中怨战情绪而通过无线电台下令撤换叛乱的杜鹤宁总司令从而使整个的军队站到革命方面来那样，旨在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宫廷政变也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需求而打倒任何顽固守旧的反动军阀。

但是，这样的政变如果期望在得到整个旧军队的支持而后作，那是不可能的。本身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大官们的旧军队的大部分将帅，对待立意打倒特权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有如孙权的吴国将校们对待关云长的态度。可是尽管如此，关云长不是仍然单刀赴了吴国的宴会吗？关云长的方法不过是紧紧抓住要害人物罢了！

对付真老虎需要胆略，击败它需要有力量。对付纸老虎根本就用不着害怕，焚毁它只需要一根火柴。

II、地方军区起义，重上井冈山，重建延安式

此种方式可能性极大，奏效亦速。

此种方式师出有名，毛主席一再号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造反有理。

此种方式拥有结构完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系统，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现成的革命根据地。第一枪一经打响，红旗一旦亮出，定将引起强烈的超级政治大地震，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修正主义大厦势必发生根本的动摇，势必从根倒塌。

此种方式小军区可行，大军区更其可行。凡不愿做民族殖民地，而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地方，更具有实施此种方式的良好土壤。

此种方式在预备时期主要应完成两项任务，重上井冈山，再建延安式。努力通过一切可能通过的渠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各大城市和本区之内，广泛地深入地把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传播开来。在传播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就扎根串连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为全面开花同时起义准备好骨干队伍。

前者即所谓“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后者即所谓“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此种方式在实行时期首先必须抓好如下一些工作。成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军政府。军政府是武装起义非常时期的非常政府，是在非常情况下从无产阶级专政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的临时权力机构。此时此地的军政府只能以特殊方式组织成立，而不可能由全民投票产生。起义领导者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条件物色和选拔坚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军政府领导核心。军政府既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又是肩负重任的前敌指挥部，它的用人原则，必须是唯才是举，用人唯贤。

在军政府的领导下，必须立即按照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基层权力机构的建设原则，遵照军政府通知规定的时间，完成工厂、农村、军队基层领导班子的民主选举工作。进行此项工作时，必须重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原有干部的政策，即免职留薪，保留原有待遇同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公民权利的政策。对于军人内部落选的干部，愿留者留，愿退伍者发给路费及特别退伍证。待革命成功后，须补发给原退伍费三倍的特别退伍费。此项基层权力机构民主选举将达到使人民

大众感到必须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的目的。 迅速招募和壮大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军队，立即争取国际承认和国际物资援助与道义声援……，等等。

采取此种方式，在预备期既要注意保密，又要声东击西设法造成最高统治集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错觉。在实行期，指挥机关应移动，行踪无定，主要是防止空降兵，应努力作好敌后尤其是各大城市的工作，以为配合。诸如此类一般战术问题，简言之，可说是精神核弹，先城后乡，遍地开花，集中兵力，主动进攻，运动游击，攻其不备，飞兵奇袭，长趋挺进，风烟四起，全民参战，决胜无敌，等等。战术问题因敌变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打法，在此即不赘言。坚信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此种方式将揭开新的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

……如此等等。

3、二次武装夺权必胜

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行动，充满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定会战胜腐朽的垂死的事物。

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定能获得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实社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推动他们能够前赴后继，能够唤起民众，能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真理，献身于理想的、伟大的、有价值的、辉煌的事业。新的社会需要未获得满足，革命运动决不会停止。人民群众一定会为解脱自身不堪忍受的痛苦而舍身奋斗。

如果修正主义在中国一时得逞，那么，诚如我们在第八章《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一节所曾分析过的那样，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面临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深远影响；十亿人的强制性的生产和生动性的消费；僵化的国内政治；地方造反的现实威胁；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人民决不会容忍下去；回光返照不久长。修正主义保护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利益，必然得罪大多数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阶级利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任何调和折衷手腕都不可能做到两全皆欢的，而欺骗只能使骗子倒霉和破产。被压榨阶级的阶级觉醒已是无法阻止的了。修正主义的道义力量何在？骗人的花招已是前番把戏，聋瞽人尚且一闻便知，何况经过十年锻炼的人民？修正主义可能支配的物质力量也已大为下降，就以军队来讲，士兵的心灵，中下级军官的心灵，难道与大官们的心灵是一致的吗？利益天壤之别，相互冲突，思想怎能一致？武器，难道至于在国内战场上甩原子弹吗？蒋介石用坦克加面包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军队与小米加步枪的新兴力量较量的结果如何？兵败如山倒全面战败。

人心向背决定一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的风暴兴起之日，就是修正主义统治完蛋之时！“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总而言之，确实路线对头，没有人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人少枪少会变成人多枪多。反之，路线不对头，其亡也速。这是为历史多次证明了的。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必然能够得其天时，得其地利，得其人和。正如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也将是必然的发展。社会迫切需要改造，需要变革，需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而战者胜，逆此而战者亡，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4、只要可能，就应该从事不朽的事业

显而易见，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已经摆在了我们这个时代

的每个人面前。每一位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尤其是军区的领导干部，更是近水楼台，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清现状非变不可的必然趋势，正确地预见未来，估计发展。不要对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制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只要你是一个革命者，只要你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制就难以容忍你继续掌权，撤换和调动将随时有可能光顾你。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必要时应当以大无畏的英勇的气概敢于重上井冈山，敢于登上天山之顶，昆仑之巅，革命到底！首义者英勇无畏，不朽业绩，将在史册上永放光芒！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一些人生信念：

“我们切不可听从人们的怂恿，认为我们是不能免于死的凡人，而去作种种世俗上浮生若梦的想法。只要可能，我们就应该从事于不朽的事业，并且不遗余力地遵循我们的最高理想来生活。”（亚里士多德）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代有一位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毛选》第3卷1003页）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

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631页）

“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马克思：《马恩全集》第一卷310页）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一、总纲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国际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用以指导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半封建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产生的、修正主义制度崛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是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对资本主义国家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对修正主义国家则是推翻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统治，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还原为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社会法西斯专政还原上升为更高一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还原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性，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对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是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夺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努力造成使官僚主义者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土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上升为高级形式，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派别和思潮，防止社

会主义社会演变成修正主义社会，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搞好国家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福利劳动保健和文化教育水平，增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和性质，积极支援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力争用新的世界革命制止世界核战争的爆发。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始终坚信不疑地运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言行一致地真诚地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斗争，决不半途而废，决不知难而退，决不允许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和扛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用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修正主义制度的超等剥削和超等压迫来剥夺劳动者、奴役劳动者、压榨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二、任务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必须坚持革命、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决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只不过是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不过是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存在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第二个目标是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第三个目标是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民

主革命，即对整个上层建筑、首先是对国家机器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只有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才谈得上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才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才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可靠的保障，才谈得上反修防修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才谈得上更大规模和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实现能够有利于帮助解放无产阶级、而不是有利于进一步奴役和压榨无产阶级的所有权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现代化，才谈得上无产阶级革命确有可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目的。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一个目标以后就停止下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了一具死胎。究其实没有达到任何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目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仍将继续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二个目标以后就停止下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遭到了夭折。其实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上台准备了条件，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超等压榨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对全人类的奴役张了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遭受到比资本剥削和压迫更痛苦、更悲惨千百万倍的特权压榨和专制的命运。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一个目标后必须为达到第二个目标而斗争，在达到第二个目标后更其必须为实现第三个目标——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加倍努力地奋斗。绝对不应停止，绝对不能停止，停止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停止就是向地狱的沉沦！

因此，必须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必须打倒修正主

义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必须坚决剔除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赖以滋生和存在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由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等所合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由第一阶段进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即由变更私有制经济基础到展开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相应地必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形式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代替一党制，必须用普选制代替任命制，必须用地方民主自治防止和清除官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分权专政、人权保障即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取代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反动透顶的社会法西斯专政，必须实现更高形态的劳动组织，采取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必须坚决执行《共产党宣言》所有基本原理，必须坚决地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潜伏在革命营垒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因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前一个阶段，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严重危害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的伟大历史运动，因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构成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在达到第一个目标以后，仍然必须继续

前进，必须为彻底解放每个劳动者，谋求每个劳动者的充分的自由发展，为彻底解放全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向征服大自然和探索宇宙空间进军，必须为全面实现最终目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三、途径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途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未到来、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总崩溃之势未形成之前，绝对不应存和平过渡的幻想，无产阶级只有诉诸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但在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且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怒潮已经产生强烈影响、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来临的情况下，在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国家即具有民主传统、工农业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则不应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或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或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应毫不含糊地把重心放在武装夺权上，而在美、英、法、德、日等类国家，则可以首先努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尤其是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宣传，尽可能揭露私有制的弊端和罪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各方面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政策，争取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政权。但同时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应吸取巴黎公社和智利阿连德的经验和教训，当选后必须坚决毫不犹豫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军事机器并适时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把武装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人民的手里。另一方面，如果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破坏民主传统、破坏普选，那么，武装起义的时机也就到来了。在这样的时机下，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应毫不犹豫地发动人民拿起枪杆子，策动旧军队广大士兵，推翻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相信马克思主

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和实践，必将推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促进国际资本主义的总崩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将得到证实。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修正主义国家推翻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统治的途径，首先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工作，尽可能揭露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弊病，尽可能揭露特权专制的罪恶，尽可能揭露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尽可能揭露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和人民大众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唤起亿万工农兵新的现实的阶级觉醒，使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排除利用矛盾说服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物转变立场投身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但其根本立场仍应放在准备第二次武装夺权上，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工作，扎实地、细致地、深入地做到广大士兵中去，扎根到整个社会上去，努力策动军队起义，准备遍地开花全民总暴动。中心问题仍然是暴力夺取国家政权问题。应高度注意政策和策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大旗，团结广大人民一道在各条战线上向修正主义统治阶级展开猛烈的进攻。在宫廷政变式或地方军区起义重上井冈山再建延安式或全民总暴动条件未成熟、准备工作未充分之前，要聚积力量，伺机而起，不要轻易采取军事行动，而应组织工农兵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劳动权利，减轻劳动强度，争取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而斗争，应号召广大劳动者用普通怠工的方式和修正主义相对抗，努力摧毁修正主义的经济命脉，以积极的态度促进起义时机的成熟。相信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传播和实践，必将从根本上动摇修正主义的统治，修

正主义制度的周期性政治危机有可能会成为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导火索，马克思主义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的统治！

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的斗争，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才能胜利，这是可以肯定的。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由执政的共产党创始人或领导人利用已有的权威和政权，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制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民主法制，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是最为理想的。也就是说，在叉路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目的，有可能通过说服的途径达到。但首要的一个前提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基本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尊重辩证法，尊重唯物论，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代表。相信只要具有这一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就能够说服执政者。“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马恩选集》第1卷第9页）

四、组织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在党的章程里自有明确的规定。这里仅谈谈一般原则和特殊组织方式。

第一条：凡承认本党纲、拥护和宣传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志愿为达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而奋斗的人，都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员。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员条件不受出身、性别、年龄、财产、职业、种族、籍贯等限制。

第二条：愿意加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人，不必填写入党志愿书，不必经人

批准，但是，他或她必须以自己的活动取得所在地区或所在单位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公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把凡是积极传播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对本党革命实践给予了道义支持或物质援助，为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而奋斗的同志，都视为本党党员。

第三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对党员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二）、积极传播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努力投身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批判修正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三）、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忠诚无畏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人权、争民主、争自由、争平等；

（四）、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敢于并善于同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作各种形式的坚决斗争；

（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自觉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努力树立高尚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坚决抵制福利主义的侵袭，正直廉洁，光明正大，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四条：凡在本地区、本单位翻印、散发、传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该文在1978年出版后{一说1976年，又一说1974年}，当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改写更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思想更为激进）一类文章的小组，即为本地区、本单位筹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领导筹建的工作，在使组

织不致遭到破坏的前提下，应取得本地区、本单位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公认，以便在条件成熟之后民主选举领导者。

第五条：党员有脱党的自由。但是，党员脱党不可出卖党的机密，否则以叛徒论处。对凡取得了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信任，尔后又向反动派告密，以至造成了对拥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群众的人身安全的危害或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事业的损失者，当视为叛徒，对叛徒必须采取严厉惩处之手段。

第六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各级领导机构按民主选举的原则组织之。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充分尊重各地区党的组织者的创造精神和革命贡献。各地区党的组织者，在不违背党纲的前提下，享有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的充分的自由。成功属于那些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能因地制宜富于创造并踏实苦干的人！

勇敢、坚定、沉着、机智、无比崇高而光辉的生命——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无敌的力量定将充满了每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心身。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决不会辜负历史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尝够了专制奴役的奴隶！

起来，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失去自由的人民！

这是最后的声音，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民主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四篇 合理性

第十四章 扬弃论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恩选集》一卷 15 页）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奠定了无产阶级哲学的基础，但是，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一系列新成就的获得，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的哲学也需要并且也必然要有所发展和丰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之后，历史已经把著述《扬弃论》的责任，摆在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前。

《扬弃论》的批判对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十分猖獗的新形而上学，即打着辩证法一分为二旗号的形而上学。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马恩选集》三卷 61 页）绝对地、孤立地、僵化地、片面地看待事物，是所有形而上学者的共性。不过，以往的形而上学者往往是在不加掩饰不予伪装的情况下表述他们的观点，而新形而上学者的特征却是打着辩证法一分为二的旗号推销他们的货色。新形而上学者自命为是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方法的忠实信徒。然而，他们正是从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和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他们确把对立统一给“一分为二”了。他们或者把对立绝对化、希图唯我独尊的“统一”；或者把统一绝对化，企图从运动中一笔勾销对立。两者异曲同工，目标一致，都以其片面性和绝对化对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两者表现

虽异根子同一，都是官僚特权僵化政治的产物。

把对立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将对立看作不可交易、不相联系、不相影响、不相渗透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就是一切皆好，好得不能再好，美化上天；坏，就是一切皆坏，坏得不能再坏，贬斥入地。对正确和错误的判断，不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而是凭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大搞绝对化：我就是绝对真理绝对革命的化身，你就是绝对错误绝对反革命的代表！只讲斗争性、不讲亲和性；只讲绝对性、不讲相对性；只讲对抗的排斥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只讲改变他物的第一次否定，不讲升华自己的第二次否定。他们的信条是，斗争就是一切，转化是不可能的，超乎本本之上的新东西是永远不能出现的，现存状况就是永久的未来，绝对地一成不变，万事不会变、不可变。他们以人害言，毫不尊重相反观点中的合理部分，并且剥夺了人们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既为相反观点保留了存在的余地，又使自己不能升华。这种新形而上学运用在科学研究上必然产生固步自封，视野狭隘等弊病，自不待言；流之于社会，则使充斥着片面性、固执己见、金刚怒目、昏头昏脑的恶斗之风泛滥开来，严重危害了人民内部的革命团结，严重阻碍了社会的革命发展。

而把统一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把自觉地维持旧质态的稳定性当作了始终的目标，只着眼数量的变化，而否定量变渐进性的中断，否认质变导致的转化，否认飞跃形成的新质态已使事物发展到了新阶段。他们在“一分为二”的幌子下，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莫衷一是，追求无原则的和平，追求没有对立的统一。他们看不见矛盾斗争乃是有生命力的统一物的存在形式，看不见任何稳定和平衡都是有条件、相对的、暂时的、看不见离开了对

立斗争展不开矛盾的本质冲突，使事物的矛盾抑制在相对静止地方的代价，就是以停滞和落后作为交换。此种新形而上学流之于社会，其恶果就是否定和掩盖现实阶级关系的变化，否认和掩盖现实阶级斗争、助长保守无为、腐败僵化、日益堕落的官僚风气，纵容邪恶、同流合污、抗拒变革、葬送革命，同样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革命发展。

《扬弃论》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关于一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两点两面圆圈发展说。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恩选集》三卷 181 页）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58 页）并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统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化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同上 31 页）

《扬弃论》将把通过对静止的观察得来的相对性，通过对运动的观察得来的绝对性，通过对发展的观察得来的必然性，复归于它们自身有机地密切联结着的整体之中。从这个整体中，我们将看到一分为二是分解法、分析法、解剖法；而二斗出三是化合法、综合法、合成法。分解、分析、解剖，是在既成的东西中找东西；化合、综合、合成，是使未成的东西成东西。只有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才是较为完整的革命的对立统一辩证法。

在凡是能够一分为二的地方，就必然有二斗出三。三是区别于旧一的一，是

新一，是异于从前而发展了的一，是不同于开端又是开端的一。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每一桩向上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新东西的出现，事物的化合，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调和、捏合。“合二而一”漠视、掩盖了事物矛盾斗争的法则，既不利于能动地、自觉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又延缓了革命的转化，阻挡了向前的飞跃，导致了停顿、倒退、向后。而二斗出三却强调并昭示了矛盾斗争法则，从事物的内在活动和必然趋向方面去揭露矛盾，并通过自觉地对矛盾的扬弃，缩短矛盾的斗争周期、解决矛盾、推动向上的发展，促成向前的飞跃、加速革命的转化，比较及时地明确认识由新的质态所展开来的新的局面。

这就是说，“二斗出三”与“合二而一”不是一回事。“二斗出三”是对“一分为二”的补充、继承和发展。但是，二斗出三所主张的斗争方法与把对立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所主张的斗争方法是不相同的。《扬弃论》将说明对立是矛盾在运动中的初级斗争形式和一般的规律，而扬弃却是矛盾在运动发展过程到了一定阶段，一定尺度上才会出现的高级斗争形式和特殊的规律。对立以扬弃作为变易的环节，扬弃则以对立作为其进行的基础。对立旨在改变他物，扬弃却不但要改变他物，而且还必然要异化对他物的改变，即不但要否定，而且还要自觉地否定这个否定，自觉地改变自身，从而，“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选集》三卷 180 页）推动事物发展、递进、上升到新的更高一级的阶段。显然，这种扬弃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保持着肯定的东西的否定，即如黑格尔所下的命题：“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逻辑学》上卷 36 页）显然，这是一种使矛盾双方都发生异化上升的扬弃。如前所说，这种扬弃决不是在没有斗

争的前提下达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对立物矛盾双方激烈交锋、斗争的结果。“扬弃”本身就是斗争的特殊的高级形式、手段。这种使矛盾双方都发生异化上升的扬弃，与折衷主义有着根本的、原则的、本质的区别，和把统一绝对化的新形而上学者所追求的统一，是不相同的。

扬弃决不是矛盾双方半斤对八两的结合。因为矛盾双方应予保留的肯定成份、合理因素本来就不是相等的，其中必有一方是主流部分，而另一方不过是支流部分。同时，扬弃也绝不是矛盾双方原有性质和形态的保留，乃是经过变易的保留。矛盾双方之所以还有如此相一致的地方能够结合起来产生新质态，一种情况乃是因为事物总是在新陈代谢的规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方面总是富有生命力的，仅仅由于新旧事物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结、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才导致了新的一方面有需要抛弃的地方，而旧的方面又还有生命力的地方需要保留。这样，就造成了新旧两方面都具有抛弃的同一性和保留的同一性。当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一经在斗争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达到了一定尺度，同向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斗争的特殊的高级的形成——扬弃就出现了。矛盾双方经过扬弃立即发生异化，使前一过程的矛盾发生质变，从而形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显现转化……等等。

附录：

李一哲大字報

李一哲：

郭鴻志 李正天

陳一陽 王希哲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1974 年 11 月街头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然而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这个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而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都说一说。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讲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 60 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样

事情：一是在多数社会主义国里资本主义复辟了，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的国家打不胜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以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说得好：

“我们快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实

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 187 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它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退学和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容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了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

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关押他们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介石经常派人来。明天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讨生活。五十年、一百年后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现在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汉几乎一样的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的皇宫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

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了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

正当广州街头“贴一撕一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8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为大字报表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18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18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18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到了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18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又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

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

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其繁的“忠”教礼仪——“早请示、晚汇报”，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上街、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罩上了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1”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恶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经济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即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

风；为“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假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吗？这是放肆的污蔑！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 30 次申，50 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了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威胁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5.16 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什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没有给以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正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得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

主席“逼上梁山”的吗？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吗？

我们说了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和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年几千年出现的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按“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林彪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就是用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吗？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他们几乎样样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积极成果可言呢？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说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绝对地为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如象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

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得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

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1848—1850 法兰西阶级斗争》）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的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现在我们看到了，从 1968 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今后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啊！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激烈的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与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

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的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理论家们问：林彪历史上“一贯右倾”，怎么好说极“左”呢？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左”时右呢？一贯的无原则而又“左”右摇摆不正是机会主义的特征吗？

理论家们问：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好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举得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即使要人们作董仲舒也还是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的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理论家们搬出了“571 纪要”，说那不是极右么，怎么好说林彪极“左”呢？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571 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能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呢？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们背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 152 页注 30）；毛主席对张国寿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 258 页注 10）；为什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如果“571 纪要”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不是等于说蒋介石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了吗？这是

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参与了“571”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林彪死党以所谓“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的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够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又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的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某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零月十八日》）如果王明反李立三的“右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这个评论中所作的判断现在却已经被证实了。

什么时候发生了“复辟”，什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

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前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复辟的年代”了！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什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这里也“复辟”了，那里也“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呢？这倒是咄咄怪事了！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1971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真是一个对第十次路线斗争不可容忍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要反复辟的。但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使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一九七一年一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的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了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攻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的“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的有两种人，反的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践效果比我们原来担心的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本能对“革命”口号是不容易发一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的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太多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竟然主要的还是成为了人民群众向林

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个的是，为什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具，不容许奴隶有一点儿亵渎。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许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黯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是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们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先是想回到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回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则企图开回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标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把“开历史倒车”的帽子扣在阻挠他们开历史倒车的革命力量头上，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党的“三大作风”，

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用“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的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的天才史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制造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成千成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么？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成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的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什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东西，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它是不会照顾什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曾狂热追随林彪，而今仍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个对联徘徊吟咏，深入

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后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极左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整死人为其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民群众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 15 岁的女孩子？黄帅的那位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所谓“师道尊严”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学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谁反对我就先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战线“反回潮”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什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实话说我们从他的卷里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是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话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怕了。

儒法斗争史的评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皇朝封建专制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起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原始公有制的建立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杜，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什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非要美化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它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不只是对剧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非常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是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已经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么？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名单，可是为什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如此，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什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哪里烧？为什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专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

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1966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吗？“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造反有理”，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吗？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1957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1956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1970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什么1956年苏联红军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1968年苏军的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们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1957年到1966年以来国际的和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认真的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的走资派了，似乎是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1957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在1966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路线，特别是林彪所推行的那条面目极“左”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融化，思想开始解放，

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一点的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了1971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并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是其中的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想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算是以身试“礼”罢。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系，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么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的读者们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1974年11月7日稿

正文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宪法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过去的反右与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新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化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好好想一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极其用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什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地实行了起来，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完全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的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的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

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就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什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吗？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的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替代法制，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什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 关于林彪体系

什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

党内推行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了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什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扫荡林彪体

系，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勃颈上深痕尚未消除，杨荣国他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敢于揭破了“礼治的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听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向我们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什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抓、该杀了吗？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仇恨的呼声喊出来了啊！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信件的大肆封锁、恫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感和担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什么压制着他们民主的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它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要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什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在党内推行

的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象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乖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秦皇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皇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否定。农民为什么要反对秦皇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皇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什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勇猛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损害了知识青年。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革命的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民群

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东西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又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里，它还孕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 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也不能逃避这个命运。今年（指一九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一个叫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吗？结果是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是到了个什么学府去深造“反潮流”的奥妙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哪有什么优哉，悠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

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借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 B52 打 B52”，B52 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受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哩！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损害之根源，他们攻击的锋芒总是向着林

彪体系，他们没有谁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的一段话。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当你们还在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哪怕一点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当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有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真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真反动派、谁是被打成的“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辨别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

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显然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和被镇压的关系改变为基于团结的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反批判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这个专政的派别若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以巩固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的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如“涌来”之势的潮流。古往今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够用几百年”的林彪体系在威慑着他们，“忠”字化运动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是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的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然影响到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即将召开“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这个被

人们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呢？

1、要法制，不要“礼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串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非把他们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也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零年的“新宪法”（草案）中。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么？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成了“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他实际上不是已经实行了）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从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宗法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

我们能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制原则真正实行起来么？

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又恰恰是他们所把持的地方和部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的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有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由于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吗？而且香花和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还是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我们不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和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2、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在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党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产品的肆意挥霍，惊人的高级享受是哪里来的？相当部分高干子弟几乎是理所当然享有财产，权力的变相

世袭又是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借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一个被人们称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列宁曾经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高薪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演变是从苏联党的高级干部实行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开始的么？在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它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资产阶级熟视无睹么？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在我们社会的现阶段存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身发展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3、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九评》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

的。”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百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字活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所必须做到的五条，但是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确立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遴选的，还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当官，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呢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最主要是人民的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该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文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4、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力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却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成为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马克思）

——不惩办一批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小蒋介石，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社会主义法制可以“刑不上大夫”吗？不可以。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

四届人大应该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5、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三年了，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政策一直落实不了？

同时，近几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

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的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的形式体现出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6、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人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被压制，特别是林彪体系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的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来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害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么？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吗？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

创造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有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用法制明白规定实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它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希望的大会。

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了，没有什么救世主，哪怕新宪法，也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谈到“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吗？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了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我们深信，一个彻底推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基本精神，并且发扬光

大。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街头张贴稿